红色年代

叶健君 主编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



周亚平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最新指示公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迁移运动开始了。在之后的十年，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离家，去到农村和山区。知青一代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思索至今仍在继续。本书即讲述这段历史。








ISBN 978-7-5060-7163-5

上架建议 历史.纪实



定价：28.00元

叶健君 主编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

周亚平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周亚平 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2
（红色年代/叶健君主编）
ISBN 978-7-5060-7163-5

Ⅰ.①知… Ⅱ.①周… Ⅲ.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史料-中国 Ⅳ.①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4703 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
（ZHISHI QINGNIAN SHANGSHANXIAXIANG YUNDONG JISHI）

**作　　者**：周亚平
**责任编辑**：王　艳　张莉娟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册
**开　　本**：660 毫米× 960 毫米　1/16
**印　　张**：11.75
**字　　数**：11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163-5
**定　　价**：28.00 元
**发行电话**：（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CONTENTS

# 目 录 / 红色年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

# 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广为流传的口号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被当年知识青年高喊着的口号，其实出自毛泽东的一个指示中的一句话，即：“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句话，经人民群众精炼提纯出来，便成了整个“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口号。那么这个口号究竟是何时提出来的？又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呢？翻开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 城市在呐喊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即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新的政府便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政策，主要围绕限额的694个大型工业项目进行建设。五年内，要建立许多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规模巨大的钢铁、汽车、飞机、拖拉机、新式机床、重型机器、发电和矿山设备等工矿企业。五年内，还要改造、扩建一批老的企业。这需要集中多少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呀。

为了动员所有的青年和学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党中央号召全国的青年和学生从祖国的大局出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参加祖国的工业建设。一时间，一代青年高喊着“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口号，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许多的青年农民也告别了世世代代小农经济的传统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大生产结缘。

但工业的发展，在当时来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而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却进一步扩大。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摆脱祖祖

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处境，最好是进城，在城里随便找个工作都比在农村种田好上十倍。这就导致大量的来自贫困乡村地区的农民疯狂地盲目地涌入各个大中小城市，加上1953年、1954年这两年因重工轻农而导致农业粮食的大量减产，无疑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也使这一时期本来就人口膨胀的各个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据1952年7月政务院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统计，除了已经安置的失业人员外，当时全国还有失业人员312万人。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各行各业每年需要增加职工大约140万人，城市中每年直接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就有100万人左右，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需要就业的人员和农村中流入城市的人数，每年也有约100万，他们都是就业对象。

虽然政府在1953年就对农村居民进城加以了限制，并将没有职业保证就进城的农民送回了原籍继续从事农业劳动。就是这样也仍然解决不了日益突出的就业压力的矛盾，且流入城市中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多，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城市人口由建国初的5800万猛增至9200万，增加的人口主要是农村迁入的农民。

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压力所至的，是城镇日益增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和就业压力。建国初期，由于新政府在积极振兴国民经济的同时，努力发展教育事业，在




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据199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年鉴》所载：1952年底，小学在校学生已由1949年的2349万人增加到5110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49.2%；中学在校学生由1949年的104万人增加到249万人，增长140%，其中初中增长168%，高中增长26%。但因当时我国的教育规模和结构都不尽合理，中小学生入学率虽然高，但高等教育的发展严重不足且成为教育发展的一大“瓶颈”，再加上建国初教育事业有一些成就，造成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教育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致使中小学生比例严重失调，很快一大部分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与就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1953年，教育部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压缩了初中、小学的招生人数。这无形之中又增大了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1952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还不成问题，但到了1953年，不能升学的人数急增至213.4万人，其中有211.7万是小学毕业生。以后不能升学的人数便逐年增长，1954年毕业的高小生达400万人，初中生60多万人，其中，高小毕业生中有63%的人不能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中也有60%的人不能升入高中。在农村，这种升学的压力更大，如当时的山东莱西县，1951年和1952年两年的高小毕业生共3390人，除少数能升学或参加工作外，留

在农村务农的有1310人；1953年的高小毕业生3518人，留乡的2438人；1954年的毕业生3514人，留乡的3028人。这些毕业生普遍的想法是继续升学，而面临失学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如此，他们只有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无疑又使本来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困扰的城市更加雪上加霜。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很多青年都把升学看做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与前途，而失学则意味着前途丧尽。他们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继续升学这一点上，当时就有这种说法："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自尽）；投空军（上吊自尽）；或是投陆军（流浪人生）。"一个升学落榜生，得知自己落榜后后，痛不欲生，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说：

> 8月5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到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

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人们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了，尽管我们

曾经批判过它，但读书能开启人的智力，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一点是古今中外谁都不能否认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对它的追求有所不同而已。读不上书、考不上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痛苦，但又是一件无奈的事实。书读不了，人还得活，出路也得找。城里的失学学生要就业，农村里的失学学生要进城找工作。

于是乎，被就业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城市在痛苦！在呻吟！在呐喊！

## 农村在呼唤

建国初，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我们的祖国有近10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我们的国家有6亿人口，其中就有5亿是农民，农业人口几乎占了全国人口的80%。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虽对广大的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差别不可能在共产党打下江山的一夜之间就缩短了距离，“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仍然无法得到迅速的改变。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之低几乎等于零，尽管新中国刚建立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并在

1952年掀起了“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的高潮，却因1953年批判扫盲工作上的急躁冒进后，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学文化的消极情绪，致使扫盲工作进展无大效。

从当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辽宁省来看，农村中，14岁到45岁的青壮年有520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就占了75%。从全国来看，农村青壮年中的文盲半文盲占了80%左右。可见如此低的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是不可能加速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们在贫穷的岁月轮回中跋涉，虽然新中国让他们世世代代就渴望得到土地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但他们多么希望自己能插上有文化的翅膀，将那贫穷落后的农村翻个个儿。然而，读过书的青年农民受社会上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学生只有升学才有出路，参加农村劳动是屈才，是没有出息的，所以他们一心只想升学读书，不能升学的则一个劲地往城里钻，即使是没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也不安心在农村。

因为当时，国家对这种升学与就业带来的压力，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劝阻农村中的失学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并极力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在客观上使历史上本已存在的城乡差别，在这部分回乡青年人当中又凸显出来，他们本来与城市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就不平等，这时又由于在毕业就业上的区别处置而进一步扩大。这种新的城乡差别的存在又使

本来就想通过升学就业来跳出“农门”的青年农民更加看不起自己的农民身份，更加不安心于农村。这就使得本来就少文化少知识的农村更加可怜。是的，当时的中国农村那么急需一批有文化的青年人啊！再加上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需要，农村中对科学文化的需求就更显得迫在眉睫了。

1951年年底开始，为增强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积极引导农民走农业互助合作道路，随后大约1.1亿农户由个体经营改造为集体经营，并且逐步实现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到1955年，中国迎来了它的高潮，“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合作化速度，惊人地成就了“鸡毛能够飞上天”的极限境界，在广泛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开始建立集体化程度较高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完全集体化的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5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从63万个发展到190.5万个，增加了两倍，入社农户7545万户，占总农户的比例由1955年6月的14.2%猛增至63.3%，每社平均户数也由原来的26.7户扩大到39.6户；高级社在这时由500个骤增至1.7万多个，增加了34倍，入社农户达475万户，占总农户数的4%。从1956年初起到当年年底，经过扩社、并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7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起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真是其势如浪

涛汹涌，并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

至此，全国的农业合作化是提前实现了，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已基本完成，但与之而来的并发症出现了。而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正如刘少奇在1957年就指出过：

>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村两个历史性的根本改革。合作化以后的农村是新的农村，农民是新的农民，但是，现在的农村和农民都还缺少文化。为着搞好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为着逐步地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农村迫切需要文化，农民自己需要提高文化，同时也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当农民。

就是说，合作社是一种组织机构，它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当时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所无法承担的任务。可农村中稍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又一个个跳出农门，做城里人，剩下来的则是那些老实巴交又没读过多少书的“泥杆腿子”。那么，农村中文盲众多，高速发展的合作社又让那些大字不会认小字不能识的庄稼汉对他们所急需的哪怕

是一个会计、一个记账员，都是望眼欲穿。于是，他们在渴望，他们在呼唤！呼唤着文化与科学将他们带进理想而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去！

## 政府在呼吁

面对城市升学与就业的压力，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文化的渴求，我们的国家向广大的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发出了呼吁。

1954年当时的农业部部长刘瑞龙在《中国青年》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积极参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农村青年的光荣任务》，他呼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新的事业，首先参加这个斗争的始终是青年。"

1955年《中国青年》的第16期上又发表了李之钦的文章《谈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问题》，指出：国家希望知识青年回乡能至少起到三种作用："首先是进行文化上的传播；其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所需要的成千成万的具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初级办事人员，也将陆续得到解决；在此，农业技术水平也会随着他们的宣传、介绍而提高。"

早在1953年的12月3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了一篇社论《组

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号召一切有文化的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同时，《人民日报》刊载了《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这在中央的报刊上首次提出了青年学生回乡务农的设想。应该说新中国一成立，国家就意识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重要性，并作出了有关指示。

这个时候，国家教育部向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5月24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批示中指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中小学毕业生之所以普遍发生紧张的升学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教育部对中小学教育指导思想上有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教育思想，继续支配着广大教师和学生，这是中小学教育方针上一个带原则性的错误。当月的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提纲中强调我国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不可分开的，一切有文化的，无论是小学、中学或是大学毕业生，都要积极地参加生产劳动，这样才能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对那种重学轻农的错误思想，要进行严肃的批判。

1954年7月11日，为了做好对学生家长的宣传工作，《中国

青年》又发表了《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的文章，文章主要向家长们解释了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随之，《人民日报》也撰文呼吁要《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

国家在1955年就制定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初中高小毕业生的基本政策”，除招考少部分人升学外，主要是号召组织一部分人去从事工业生产，大部分人去从事农业生产，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可见动员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从事劳动，在当时来讲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

为了加强这项工作的开展，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社论。5月22日，中央宣传部又颁发了《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自此以后，加强劳动教育被提到了中小学的教育日程上来。

7月14日，《中国青年》头版发表社论，即《加强对初中、高小毕业生升学、就业的指导》。社论明确提出：家在农村的毕业生应全部回到农村去；家在城市但有条件去农村的，也应适当地组织和具体帮助他们到农村中去。从此，国家又将家在农村又不能继续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全部疏导回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

8月11日，针对当年暑假全国将有57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

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加上往年没有考上学校或者没有找到职业的学生，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的问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文章指出：

>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目前农村正在大力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对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但这篇社论在对待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劳动这一问题上则持相当稳重的态度,仅在分析“人人要工作”的社会舆论时说:首先,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般不应有所谓“就业”问题，当他们在小学毕业以后，如果没有思想障碍，他们完全可以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而家居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目前如考不上学校，又找不到职业，就应该进行自学，等待机会就业。各地青年团组织应该积极组织和帮助他们做好自学的

工作，或者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

国家在当时除了呼吁有文化的青年学生从事生产劳动，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外，还在行政上采取了控制招工的手段。1955年8月22日，国务院就控制各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增长和加强劳动力管理问题发出指示。指示决定：自1955年下半年起，中央各部及各省（市）人民委员会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除在现有职工总人数（包括归口安排的私营工商从业人员）进行调剂外，应停止从社会上录用新职工。无疑，将绝大部分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希望掐断了。

城市就业人口的恶性膨胀，农村知识型人口的奇缺，已经给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带来了严重制约恶果，国家已不堪重负。除了将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送回乡村，除了让农村中的失学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还有必要让城市里的失学青年下放到农村中去。12月8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劳动部党组《关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指出城市失业问题只有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对于不能继续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应教育他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大部分就业方向是参加农业生产。年底，劳动部在全年工作总结中说：本年会同有关部门动员了一批城市失业工人、失业青年及其他剩余劳动力，采取还乡生产、移民垦荒、移民插队等办法进行安置。仅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重庆、浙江、黑龙江等8个省市就安

置了86万人参加农业生产。这86万人应该说是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放弃了城市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立志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但当时的人数还是很少的，且大多数是下到市郊比较富裕的农村去的，这与以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不能相比的。不过它在当时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而对于每个下乡参加生产劳动的青年来讲都是非常光荣而神圣的事业。

## 领袖发号召

如前所述，农业合作化运动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年底，已经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但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与矛盾，失学与就业这两大问题是当时最令党和政府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在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个关键时刻所显现出来的问题，毛泽东于1955年9月至12月，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其中许多的文章加了按语，特别提出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在《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这样写道：

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

毛泽东的这个按语是鉴于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中需要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需要大批财会人员，而合作社本身又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在《吕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技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如是说：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

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吕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的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这个按语提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急需文化的重要性，并明确肯定了农村中的中小学毕业生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中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



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

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就是日后流传甚广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的最具权威的原文版。反过来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是这个最高指示的精华浓缩版。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当时的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党支部在组社时，就出现过“争骨

干，争识字人”的情况，党支部便统一规划，把未曾继续升学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合作社，解决了合作社没有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毛泽东阅后，对其大加赞赏，亲笔写下了这段热情洋溢且最具广泛持久号召力的按语。受到毛泽东赞扬的大李庄乡，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按语，成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并在以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接纳了数以千计的下乡知识青年。

尽管此时毛泽东说的只是针对那些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而言，但“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却成为当时激励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精神力量。

## 团中央号召和组织城市青年“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到农村落户”

在那个年代，大凡中国人都有一颗易激动的心，只要领袖发出一声号令，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激动，接下来便是坚决执行。毛泽东一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所有的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当时，对毛泽东的这个最高指示做出反应最快的莫过于青年人的组织代表——团中央，迅即进行“组织城市青年下乡的试验”，主要形式是“青年远征志愿垦荒队”，随后又组织知识青年直接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 “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幅员辽阔，的确是一个广阔天地。但这个天地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天堂”，它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它的耕地面积还只有16亿亩，与960万平方公里相比，它还只能算是一块未开启的土地。为了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保证用粮的需要，1955年2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青年团北京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发出号召，号召所有的青年人踊跃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建设祖国的边疆，用他那激昂的嗓音朝大会的代表们喊出：

> 开荒的大风暴还没有来，但大风暴之前必然有闪电！北京，可以带头，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知识青年下乡！

尽管胡耀邦的号召是那样充满激情，是那样赋有感染力，但城市青年下乡务农在当时还不可能完全被接受，许多的青年学生抱着犹豫、审慎的心态在等待，在观望，甚至在逃避。

为了让青年学生丢掉思想包袱，积极加入到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行列，团中央于同年4月间，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考察了解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因为苏联共青团从1954年开始会同有关部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动员了两万多的青年到边远地区垦荒建场，实现了苏共中央制定的2800万公顷的垦荒计划。

7月，团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了“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

8月，团中央书记处会议又根据中央《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的初步意见》的精神，借鉴苏联的经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有重点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并通过北京市团委牵头，着手筹建第一支青年垦荒队。

8月9日，由《中国青年》记者、同时任团中央垦荒筹备组成员的舒学恩执笔，5名青年骨干以发起人身份，向青年团北京市委递交了申请书：

请批准我们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使我们能够为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




这5名热血青年就是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共产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和南苑区的李连成、李秉衡，东郊区（今朝阳区）的张生和门头沟区的庞淑英。

这则消息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一发表，很快在北京青年中掀起层层波澜，纷纷报名申请参加垦荒队，情景十分感人。有许多的青年还捐钱捐物，以此表达他们支持的心愿。不到10天的时间就收到6969.4元捐助款。

19日晚，胡耀邦接见了这5名发起人和垦荒筹备组的成员，代表团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提出："因为这是第一支队伍，所以规模不宜太大，先组织60人去，明年以后再陆续增加。"

8月30日，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共计60人。当天北京市1500人为垦荒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高度赞扬这支队伍"是光荣的第一支，是中国青年的一个有意义的创举"。号召青年克服困难，在荒原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随后，他代表团中央将一面"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授予垦荒队队长杨华。

9月初，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在祖国的北疆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南20里的团结村，建立起全国的第一个垦荒点——"北京庄"，从此荒凉的北大荒，燃起了不灭的青春之火！

不久天津、河北、哈尔滨等省市也相继在北京青年的影响下，

组织了同样的垦荒队，于1955年底接踵抵达北大荒，联合成立了青年垦区。到1956年底，在北大荒共建立了北京庄、天津庄、河北一庄、河北二庄、山东临沂庄、山东胶南庄、山东惠民庄、哈尔滨庄等8个集体农庄。

继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之后，1955年9月11日上海也组织了由100人组成的青年垦荒队奔赴江西。当时上海有1万名青年要求到淮北去开荒，毛泽东得知此消息后，曾指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说：淮北条件太差，是否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和上海更为接近，吃的也是米饭，江西又是革命老区，那里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需要支援。随即，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了近100人的垦荒队伍，打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红旗，唱着《垦荒者之歌》，来到了鄱阳湖畔的德安县。这就是胡耀邦在一南一北树立的两个榜样，当年的11月19日，胡耀



到农村第一线的上海知青

邦还受毛泽东的委托，前往江西看望垦荒队，并亲笔题写了“共青社”。这样，江西德安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诞生了。

1984年、1985年，胡耀邦曾分别去江西与黑龙江视察了这两个地方，并分别在江西“共青社”和黑龙江的北大荒书写了“共青城”和“共青农场”的题词。后来1989年他去世后，他的夫人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了江西“共青城”。这充分说明了胡耀邦对当年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高度关注与重视。

以后，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一批批青年垦荒者陆续奔赴祖国的边疆与农村，改造荒山野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曾不遗余力地对这场垦荒活动大肆宣扬，推波助澜。1956年1月24日，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青年们，开垦荒地去，在那里成家立业吧》的文章，整版报道了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情况。一时间，胡耀邦的讲话被谱成了歌曲《青年们，向荒地进军》在全国各地到处传唱，垦荒活动达到高潮。

1月31日，来自浙江温州市学校的青年组成了260人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响应团中央的号召，登上了大陈岛。行前，团中央派专人前往，向志愿垦荒队赠送题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队旗，并宣读了团中央的贺信。

大陈岛是浙江省台州湾的一个外围岛屿，蒋介石的军队曾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陈浩劫”，烧毁了村镇，劫走了居民，断绝了炊烟，把大陈岛变成了一个无人烟的死岛。为了使“死



到祖国边疆去

岛”复活，1956年1月，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视察浙江，同青年团地、市委书记座谈时，发出了“组建垦荒队，开发建设大陈岛”的号召。仅在一个星期内，就组成了这支浩大的垦荒队。

由北京青年发起点燃的垦荒之火，迅速遍及祖国各地。据有关部门统计，当年共有21万人参加了这场全国性的垦荒运动。

这场垦荒运动，的的确确是中国知识青年高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口号的前奏中的一个响亮开端，其势虽非汹涌浩荡，却也初澜荡起，它影响了为数不少的城市知识青年和农村回乡青年积极投身其中，它所激励起的奋斗与献身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乃至后来的知识青年。同时，对于中央政府来讲，

这场运动也给了他们许多的启发与经验，并因此形成了以后一段时期安置知识青年到边疆“屯垦戍边”、上山下乡运动中一种固定的模式。

## “做新中国的新型农民”

按照团中央的思路，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的、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解决当时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但这场垦荒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仅仅是热闹了一时，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以及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它的发展壮大。比如当时的两个全国著名的典型江西“共青社”和浙江大陈岛，每年的人均收入也就200元左右，甚至不足以维持个人的基本消费。

各地经过整顿，撤并了一批垦荒队。后来也大都将垦荒队陆续归并到就近的国有农场或农业合作社内。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垦荒队办得确实很好，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比如，昔日的江西“共青城”，今日已被誉为“鄱阳湖畔明珠”和享有“羽绒王国”的盛名，并因此蜚声海内外；昔

日荒凉的大陈岛，今天已是高楼矗立，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被列为全国海岛经济开发建设4个示范岛之一，中国—欧洲共同体新能源实验和示范基地。

垦荒运动是停下来了，可国家的负重仍然要解决。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

>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

这里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到农村中去，是“下乡”。在新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一词并沿用了好多年。但后来又为什么改为“上山下乡”的提法呢？这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1958年上海市的宣传报道中曾使用过“上山下乡”一词。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在三次会议上强调提出上山的重要性，他认为：“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他的讲话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从此，

就在全国范围内陆续使用“上山下乡”这个提法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下乡上山”范围作了明确界定，其主体就是在城市不能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考虑到小学毕业生年龄小、独立生活能力差，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不再把小学毕业生列为下乡对象。当时，这是一条十分可行的解决就业的道路。

可惜的是，这一年的年初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对青年垦荒乃至整个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活动都是一种釜底抽薪。各部门各地区为了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竞相扩大基建规模，盲目招收新工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56年9月底，全国已新增职工224万，其中有76万是来自农村。由于就业矛盾的突然缓解，青年垦荒运动因此偃旗息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口号实际也因此而陷入尴尬境地。到这时为止，人们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事实上，从一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以“动员”二字为重点，青年学生们不可能是发自肺腑自愿放弃学业、放弃前途、放弃城市中的优越条件去到艰苦的农村和山区苦度年华的。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但国家又不能强迫青年，那就只能号召和动员了，一幅理想的充满虚幻的“广阔天地”的美景之图在诱惑着青年。而青年们尽管富于朝气、

富于探索精神，但也希望国家能尊重他们的选择。无形之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冲突。

在当时许多的青年人中，不但对国家提倡的"下乡上山"运动有怀疑与抵触情绪，且还出现了一种逆反行为，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的辍学之风，且愈演愈烈，到1956年初达到高潮。据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分析：学生的退学辍学，是每年都会有的现象，但这两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十分不正常。其原因，一是动员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靠记工分吃饭，孩子早些回家，还能多挣些工分。二是部分农民承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三是随着1956年又一次的经济过热，到处出现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很多地方乱拉在校中小学生参加工作或到农业社担任会计，由此便引发了这场严重的辍学风。据统计，1956年初，全国辍学的小学生达510万人，初中生达15万人，有的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学生总数的50%以上。这应该算是人们尤其是农民对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这种做法的一次无声的抵制。

随着经济冒进而来的是反冒进。1956年，国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开始压缩基建规模，进行整顿劳动组织工作。1957年1月12日，国务院就通知各地，从本月起，停止企事业单位自行从社会上招收人员。2月15日，中共中央要求各行政部门、事

业单位、企业单位“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国务院还决定中等专业学校、工人技术学校停止从社会上招收新生。接着，劳动部发出对城市失业人员进行清查和安置工作的通知。实际上，一切大门都向青年关上了。于是，当时包括就业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

对于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政府采取的是统筹兼顾的方针，适当安排。可问题是如何安排？安排他们做什么？成为政府的一大难题。

针对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问题上出现的紧张形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于1957年春，在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五省进行了视察。从2月18日起至4月14日，历时56天，行程8000余里，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讲话经整理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于4月8日刊出，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反响，后来还成为中小学毕业生的政治教材，也成了宣传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主要思想内容之一。以刘少奇南下讲话精神写成的这篇社论，更明确提出：

> 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生不能升学，而城市就业条件有一定限度。就全国来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

多的方面是农业。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刘少奇的讲话应该说是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指示的更具体的说明，为什么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而在那里又是大有作为的呢？恐怕只有刘少奇的讲话才是最实在最直白的了，就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有如此更具体更详细的解释。而讲话中的那句“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则可以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的翻版，也正是这个“翻版”才最能打动青年的心，以至成为当时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喊得最响的口号。

这年的夏天，一些城市的下乡知青又开始增多起来。但这时仍是由组织出面安排城市青年下乡试点，处于摸索经验阶段。6月18日，湖北武汉市组织首批81名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成为全国动手最早的城市。接着武汉市又组织第二批和第三批共3800余名青年分别于8月初和9月中旬下乡。长春、沈阳、天津、青岛、济南、包头、北京等城市，在一两个月内也相继组织了1000余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到1958年上半年，全国下乡知识青年约1.5万多人，其去向主要是到城镇郊区，只有少数是到山区。

当时中央是这样考虑的：首先，农村是特别需要劳动力的，



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

特别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其次，城市中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对下乡务农是持抵触情绪，要选择一些家境贫困且思想觉悟相对高的青年学生先下去；第三，由于离城市很近的郊区与城市区别不大，可组织青年就近到郊区参加农业劳动；第四，选择一些基础比较稳固的农业合作社，并同有关的农业社达成协议，把青年学生分散安置在社里的积极分子家里住。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即可使下乡上山运动持续发展下去。

但在当时，许多的具体矛盾应运而生：农村是否需要这些城市青年？城市青年下乡以后是否大有作为？尤其是下乡以后城市青年的生活怎样安排？经费由谁承担？政府过多地照顾学生，

农民不满；对学生卡得过严或根本不管，学生反感，等等。尽管当时的武汉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做得比较好，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全国各省也纷纷参照执行，但问题是农民与城市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想想，农民是带着自己的土地、牲畜等财产，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又天生具有狭隘的农民意识，城市青年如果像玩空手道似的加入进来，不仅农民不答应，就连农业社也不会允许的，即使是知青交纳入社基金，但那是属于向社里贷的款，对农民和农业社来讲都属于额外的负担了。如果让知识青年交纳入社基金，在下乡三五年之内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的工分偿还这笔钱，那知青又拿什么生活？这对知识青年来讲也是不公平的。知识青年下乡不仅是加入到农村这个天地当中去，更重要的是要生存，没有基本的生活费用还谈何大有作为？比如当时的湖南衡阳市郊有叫北塘和五一这两个农业社，共有17个下乡的城市青年，据他们的收入统计，一般每人每月能挣到15元钱，最多的也有30多元，当地的宣传机构据此而下了个结论，说照当地伙食费标准每月9元计，城市知青只要安心劳动生产，一般都能维持生活并有节余。事实上，伙食费只是生活费的一部分，他们还要偿还他们入社的交纳基金呀。

所以说，“大有作为”这个带有理想色彩的口号实际上是与现实脱节的。尽管“立志做祖国新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到




农村去安家落户”，一时成为动员城市中中小学毕业生的响亮口号，但到后来，情况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想，大多数人都敲了退堂鼓，据1964年团中央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称，1957年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约有1/4后来巩固在农村。也就是说只有不到4000人仍留在农村。一场被时人认为是方兴未艾的群众性下乡务农运动，到这时仅仅是骤然掀起的一个小高潮，很快就重蹈了那场垦荒运动的覆辙，又偃旗息鼓了。

## “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

当历史进入1958年的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推动了“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会议充分肯定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我国正在经历马克思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以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会上，有117人口头发言，140人提交书面发言，中共28个部委提出向中央的报告。这些发言和报告，虽不乏脚踏实地的内容，但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跃进计划和生产高指标。

以后三年，“全民大办钢铁”，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经济

发展的常规被完全破坏外，工业建设毫无节制地高速发展。很快，这场唯意志论指导下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盲动，就孕育出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土法上马，遍地开花，就需要很多人投身到这场火热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自然，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增大，当时，不仅刚毕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很容易找到了工作，1000万农民也进了城当上了工人。仅这一年内，全国共增加职工2000万人，相当于前8年增加职工人数的1.26倍。年终，国家劳动部宣布：“彻底地完成了消灭失业现象这一历史任务。”

“大跃进”的高速度给生产力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损失。1960年，随着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城市发展严重滞缓，没有完工的工程项目被迫放弃，涌入城市的农民又不得不再返家乡，就业的压力再一次呈现在决策者和城市青年面前。实际上，在1958年秋冬之际，党中央就开始意识到了“大跃进”所带来的恶果，这年的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提出要纠正“左”倾错误，要收回某些已经下放的权利，加强中央调控能力。

1959年1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各省、市、自治区的年度劳动计划，必须报中央审批。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的紧

急指示。决定年内减少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800 ~ 1000万人，从而减少工资支出15 ~ 18亿元。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八字方针”。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5月，中央工作会议又提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决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1961年就减少1000万，其中职工970万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实属空前绝后。周恩来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无感慨地说：这个决心要下，其目的是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之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件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他还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以至于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后来谈到这一决策时也感慨万千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在这种情况下，号召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一事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我国每年的同龄青年约1500万人，绝大部分家居农村，而城镇青年仅有300万人。可就是这300万人，能够继续升学或就业的只是极少数。为此，中央决定，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参加生产建设。

1962年11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三条安排城镇青年出路的建议，一条是上山下乡；第二条是城市就业；第三条是组织自学。并且认为，从目前和长远来看，安排的主要途径是上山下乡，其具体形式有三种：第一，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最主要的形式。第二，安排到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不少地方还采取发动知识青年投亲靠友，有的职工偕同家属一道投亲靠友，或者暂时把知识青年编成小组，集体生活，分散劳动。第三，采取试办半农半读学校或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等形式，将知识青年组织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习惯于农业劳动，适应农村生活后再到农村长期落户。

这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带有明显的紧迫感和临时性的特点，应该说还不能算是一场精心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3年开始的。

1963年6月29日到7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6个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这次会议预示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来临。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调整安置工作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的问题，并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

(1964—1979)。计划编成，经审定后，应纳入国家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

安置城市青年，原本主要是到国有农场去。据团中央1963年11月对辽宁、吉林、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7省和北京、上海两市的统计，1961年以来动员下乡的青年有14.9万人，其中到国营农、林、牧、渔场的11.5万人。安置到国有农场的知青在身份上属国有企业农业工人，按月领工资，并享受劳保福利待遇。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农场能够接纳这些知青的容量是很有限的，且国家财政负担也很重，安置一个城市青年到国有农场去，国家需要财政支出在1000元左右。到1963年5月底，原计划去农林场33.2万人，只完成了15.4万人。这样看来，城市知青的主要安置去向究竟放在哪里为好，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1963年的6、7月份的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议，原定主要讨论国有农场的安置工作，后来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将会议的重点改变了，即调整安置工作方向，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提到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

这次会议是围绕知青插队落户这个中心议题进行的。周恩来在会上就指示，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牧、林、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牧、林、渔场。要求各级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把插队工作统管起来。

其实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是邓小平。1963年7月9日，国务

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安置领导小组会议上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于插队安置，想了好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员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路线的安置形式。周恩来在会上也说过：插队本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当时的浙江嘉兴县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所以在这次会议后，安排下乡知青，开始转为以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为主。插队的形式也很多，一是集体插队，即到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一般是三五个，顶多10多个，集体吃饭，集体住宿，分散到队里参加劳动；二是青年单身插队落户，少数是住在干部或社员家里一起吃饭，有的单独居住，自己开伙；三是投亲靠友；四是在那些有成片荒地的公社，以下乡青年为主，搭配些农民，成立自负盈亏的生产队。

实践证明，插队落户的容量很大，国家花钱少，收效快，被当时认为是一条安置城市青年下乡的“好路子”。1964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城市青年下乡问题时说：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安置费不到200元，而到国有农场则每人要1000元，如果一年100万人插场的话，国家需要支出十几个亿，这怎么得了！

周恩来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并提醒做知青工作的同志说：脑

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要从这里出发。

因此国家把将安置城市知青的目光转向农村人民公社作为一项长远规划在抓，是情有可原的，不是因某位领导的头脑一时发热而闪出的一个不着边际的念头。知识青年到农村人民公社这个广阔天地插队落户，就成为以后15年安置知青的主要形式。当时的有关部门非常乐观地估计了形势，说全国有540多万个生产队，在15年内，每年先后插入两个人，就可以安置1000多万人口。

为了真正落到实处地安排好知青下乡，中央和各地都先后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专门机构。1964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和团省委还组织了由16人组成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巡回报告团到长沙、衡阳、益阳、湘潭、邵阳、常德、株洲等市巡回演讲，用优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亲身感受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大凡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洋溢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让所有的知识青年，不管是城里的或农村的，都明白农村的确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论，指出：本报发表的浙江省嘉兴县安家落户的2390名知识青年和到辽宁省金县梨树沟的27名城市知识青年的事迹，证明了下乡



1964年4月，农垦部部长王震在北京与即将赴北大荒的北京知青座谈

上山确实是城市知识青年的一条宽阔大道。2月28日，该报又发表了题为《热情关怀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社论。指出今后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将日益增多，如何认真做好团结、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工作，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使他们落脚生根、开花结果，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应当是各级党、团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9月8日《中国青年报》也刊载了一篇评论文章，鼓励城市青年积极投身到下乡运动中去。

这场知青下乡运动的再度掀起，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前夕。据统计，从1962年始到1966年8月“文革”爆发前，全国共有城市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超过百万，达到129.28万人，占整个下乡人数的65.6%。正如《人民日报》所载《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一文中说：到农村去，已在我国城市青年中逐渐形成一个革命浪潮，“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随着城乡“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而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1962年，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开始了。顿时，全国上下都能感觉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在紧张地朝每个人袭来。再加上当时苏联的“变修”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了不使我们的党变修，我们的国家变色，很有必要在青年人中进行关于红色接班人标准的教育，这些都无疑使知青下乡运动开始笼罩在“左”的乌云之中。1964年9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表达的观点，就反映了这一点：

参加农业劳动是……革命的知青所应走的一条重要道路……农村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在石河子农场同上海支边青年亲切谈话

三大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中心，那里各种斗争最尖锐最复杂。通过到农村去接受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知识青年可以创造出促进自身思想革命化的极好条件……知识青年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普通劳动者，才能实现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在农村和劳动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可以使知青逐渐培养起参加体力劳动的热情，端正对体力劳动的态度，并且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永远防止他们蜕化变质的一条重要措施。

实际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在此时也因此而完全被披上了一层政治理论的外衣，且因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而变得更加不可一世起来。下乡是革命的，它有着光荣的远大的前途，否则是不革命的，就没有前途，这就是这句口号的真正意义所在。听听1965年《中国青年报》1月7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路金栋所说的一段话吧：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农村，是你们的课堂，是你们的战场，是你们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多么动听！多么鼓舞人心！有哪一位知识青年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又有哪一位知识青年能不高喊着那句口号“高高兴兴”地到农村去？

家庭出身好的知青是如此，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是如此，因为在加入到下乡队伍的青年中，为数更多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虽然在青年中也曾大张旗鼓地宣传了“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鼓荡下，阶级成分的因素无端被夸大了；尽管知



知青上山下乡宣传画

青本人都出生在新中国，可家庭成分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更改、也无法变更。但更多的此类知青，为了摆脱家庭的阴影，求得在人格上的平等，他们不得不使尽全身解数，企图通过下乡锻炼这条光明之路以达到脱胎换骨的人生的一次解放，最起码也可以从中求得精神上的一种暂时的解脱。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小册子，叫《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宣传的对象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书中收录了几位此类青年，由于选择了下乡这条革命的道路，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就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就是出身不好不要紧，

重要的是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与反动的或者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到1966年止，全国下乡上山的城镇知识青年当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些原始材料记载，1963—1966年进疆的上海女知青中，50%以上的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有些地方，知青几乎是清一色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弟组成，1964年北京赴山西曲沃集体插队的44名青年，据说全部是所谓“杀、关、管”的子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革命改造”的地方。

当然，总的趋势来看，这一时期的知青下乡运动还是健康和平稳发展的。周恩来对此曾兴奋地说：现在，上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而且多数稳住了，这就是很大的成绩。当年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了全中国。今天，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文化部能不能拍一部大型纪录片，题目就叫“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后来。著名导演谢铁骊承担了这个任务。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部片子才未果。

总之，120多万青年奔向农村，尽管带有某种被强制性，但大部分都是高高兴兴带着理想、充满希冀在广阔天地里挥洒着青春！

## 他们是当时早期知青中的典型，他们的名字代表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

20世纪50年代的徐建春、吕根泽、杨明汉等，60年代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他们是当时早期知青中的典型人物，以至于人们一提起“知识青年”这个名词就会想到他们的名字，而一说到他们的名字就会想起知识青年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



### 第一颗知青明星

徐建春，20世纪50年代初回乡知识青年中

一颗耀眼的新星，也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颗明星。

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作为党报，正式为全国知青树立先进典型，此为第一次。从此，徐建春的名字像春风般迅速吹遍全国各地。

徐建春，女，山东省掖县过西区后吕村人，出身农家。1951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只好放弃继续读书的梦，在家务农。此时，正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吕村也在积极组织互助组，徐建春生性好强，又是村里稍有文化的女孩子，懂得识时务，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便和村里的另外4户人家组成互助组，并由她担任互助组组长，当时她还只有17岁，正是花季年华。小小年纪像个初生的牛犊，天不怕地不怕，带领互助组积极生产。在当地，妇女没有下田耕地的习惯，徐建春却不管，带头向老农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秋季麦收时，互助组里的劳动力不够，她就发动妇女们下地帮忙，并把年老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农闲时，她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学习文化与科学知识。她对互助组实行民主管理、分工负责，把个小小的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热火朝天。慢慢地，自愿加入她这个组的人越来越多起来。就这样，她办的互助组的先进事例很快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并进行了大力宣传。1952年10月，也就是她回乡后的

第二年,《山东青年》率先以《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为题,介绍了她回乡后担任互助组组长的先进事迹。接着,她在青年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受到奖励,成为青年团山东省委的候补委员,还参加了北京国庆的观礼。1953年她又参加第三届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访问。此后,徐建春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锻炼成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最具说服力的典型,她后来入了党,从一个小小的互助组组长变成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女社长之一,并被评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央委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政治舞台上尽领风骚。

## 劳动与知识相结合的回乡知青

吕根泽,一个20世纪50年代劳动与知识相结合的回乡知青典型。

1953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团中央写给吕根泽的一封信,信中说:

吕根泽，你热爱农村，投身于农业劳动，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并有力地推动了你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而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你的事迹，再一次告诉了农村广大知识青年如何与农业劳动相结合，向他们证明了知识青年从事农业有无限光辉的前途。

12月25日，该报又发表了署名王石才的文章《站在建设前列的年轻人——记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以及社论《用吕根泽的范例教育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从此，吕根泽的名字也因团中央的大力宣传而响彻四方。那么吕根泽究竟是何许人？何以如此引得青年团的最高组织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当时全国的知青明星呢？

吕根泽，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人，朝鲜族。1951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正准备升入高中时，医院里的一纸肺结核病的诊断书让他的读书梦破灭了。当时，他的情绪极为低落，甚至是极度悲观，在他看来：希望破灭了，前途尽丧了，"一切都结束了"。后来在当地党团组织的关心与帮助下，他开始认识到：不能报考高中，并不等于失学，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走进学校。这所学校是丰富的，它不仅是农业大学，而且是社会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不仅能学到许多的社会知识，还能将自己在中学里学到的书本知识

派上用场，使劳动与知识有机地相结合，也使自己真正地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从此，他便积极投身于家乡的生产技术，开辟一块农业试验田，向当地农民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担任全村的技术研究组组长。他们的互助组由于采用了他推广的新的水稻种植法，粮食大大增产，平均每垧（合15亩）收获比从前的种植法增产了1000公斤，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全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吕根泽的先进事迹得到团中央的高度重视后，1954年2月17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在接见吕根泽时提出，要“让吕根泽到各地去做报告，以自己的体会向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说明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是必要的。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没有一定数量的知识青年参加是有困难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绝不该都挤到学校和机关里去”。随后，吉林省团委在全省团县委书记会议上做出具体布置，采取多种方式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宣传，据称，“这次宣传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在吉林省来说还是第一次，基本上达到了人人皆知”，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58年，各地农村大办农业大学，吕根泽进入延吉县东成乡办的黎明业余农业大学学习。1961年又被公社保送到延边农学院深造并拿到大学文凭，期间，他在老师的帮助下，写成了《水稻栽培技术问答》一书，并取得了多项水稻研究成果，被聘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约助理研究员，成为知识青年在农村成长

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典型。直到现在他仍然活跃在延边农业科学院的科研战线上。

## 最有作为的光辉典型

邢燕子，一个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也是回乡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最有作为的光辉典型。

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她的名字几乎成了知识青年的代名词，是毛泽东亲手树起的整个一代知识青年的学习榜样。

邢燕子，原名邢秀英，天津市某厂副厂长的女儿，家人均在天津市工作，唯有她跟着爷爷在河北省汉沽市（今属天津市宝坻县）大钟庄人民公社司家庄生产队生活。1958年7月家乡遭水灾，18岁的她正好初中毕业，那时，农村的劳动力正大量地进城，她本可以离开农村回到父母亲身边在城市工作，却毅然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立志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连续两年的水灾，使司家庄几乎绝产，乡里的人们纷纷往外逃的逃荒，进的进城找工作去了。在灾后面临饥荒的严冬，她却和村里7名女青年，组成了北大洼第一支妇女捕鱼队，在刺骨的寒风中破冰捕鱼，夜晚还点上马灯打苇帘，这样苦干了3个月，仅这两样

副业就收入近4000元，为全生产队度过饥荒立下了汗马功劳。村党支部在全村的群众大会上表扬了她们，并把这支捕鱼队命名为“燕子突击队”，邢燕子为突击队的队长。“燕子突击队”组成以后，她们战天斗地，使司家庄的生产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一些不安心于农村的青年从城里回到了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邢燕子的事迹，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1960年，正是我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一个学赶邢燕子，“发愤图强，大办农业，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人民公社”的高潮，在河北省的广大青年中掀起，进而在全国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8月15日，《河北日报》首披，并发表了题为《发扬邢燕子发愤图强的革命精神》的社论。19日，共青团河北省委和河北省妇联又发出了在全省青年和妇女中开展学习邢燕子活动的通知。9月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题为《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的长篇报道，并在头版以套红的通栏标题刊印出来，显示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重视。为了在全国造成一种空前的声势，宣传部门更是四面出去，不仅将邢燕子的事迹拍成电影，而且几个剧团还同时编演了有关剧目，在全国上演，就连我国著名的大文豪郭沫若，也特地赋诗《赞邢燕子》为其推波助澜：

邢燕子，好榜样！

学习王国藩，

学习铁姑娘。

全家都在城，

自已愿留乡。

园中育苗苗成行，

冰上治鱼鱼满网。

天寒地冻，抢种垦荒，

要使石头长出粮。

吃苦在前享乐后，

一切工作服从党。

北大洼变成良窝，

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

邢燕子，榜样好！

青春献农村，

青春永不老。

一马能当先，

万马齐赛跑。

立下雄心天样高，

鼓足干劲奋力跑。

克勤克俭，有说有笑，

能把劳动当成宝。

为国为社多打粮，

国好社好大家好。

司家庄变成鱼米乡，

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长江。

一时间，邢燕子成了全国的知名人士，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是给予她的崇高荣誉。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诞辰，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用毛泽东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设便宴祝贺，当



毛泽东亲切接见邢燕子

时只邀请了参加第三届人大的知名人士10多人参加，其中就有邢燕子和董加耕两名下乡知青代表，他们分坐在毛泽东的左右两侧，席间，毛泽东问他俩文化程度怎样，以及读书与工作等情况，还多次给他俩夹菜劝餐。此事和照片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很快在城市知识青年当中引起轰动。

作为新式农民的代表，邢燕子曾先后出访罗马尼亚、朝鲜、日本、西班牙等国家；被选为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并当选为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历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天津地区妇联副主任、革命委员会常委，共青团河北省委副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 光芒四射的知青典型

董加耕，一个20世纪60年代初光芒四射的知青典型，其名声曾一度盖过邢燕子，几乎达到知青典型的巅峰。

从1964年年初开始，先是《中国青年报》，接着是党报《人民日报》和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对董加耕进行大量的

宣传报道,《人民日报》称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是勇敢的革命先锋，赞扬他所走的道路是毛泽东时代青年所应该走的道路，其宣传的力度与规格就连1960年对邢燕子的宣传也无法与之相比。他在回乡务农中所写的日记在当时的党报和杂志上都全文刊载，全国上下无人不晓，日记中的那些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几乎响彻全国，听听：

> 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新中国成立前，第一线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我到农村去，不正是党所需要的吗?
>
> 体力劳动是一座不朽的熔炉，我是一块矿石，一定要炼成不锈之钢。
>
> 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多么动听！多么激人奋进！不愧为那个时代的强音！

董加耕，男，江苏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高中毕业。在校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为了响应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号召，他在升大学的志愿书上写下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字，并改原名“嘉庚”为“加耕”，回到家乡当农民。当时正是中央号

召大办粮食、压缩城市人口的时候，这位20岁的充满理想的农民之子满怀豪情地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要留在劳动人民中间，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用双手创造世界！"这位贫农的后代的确不简单，不仅家庭成分好，且政治面貌也出色，中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加上学业优秀却又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主动放弃进大学的机会，实属难能可贵，是一棵根红苗正的好青年，因此，从他回乡务农的那天开始，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62年，江苏省省报《新华日报》就以《目标始终如一——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还乡前后》为题，报道了他的回乡经过。1963年，江苏省在全省青年中开展学习董加耕的活动，到1964年的9月份，江苏省近7000名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绝大部分是学习董加耕的中学毕业生。20多年以后，董加耕谈到过他的一个亲身经历，说是有一次他出差到常州，在一家旅馆里，一些住店的客人听说他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董加耕，都很高兴地围过来告诉董加耕，说他们都当过知青，而且都是在他的感召下、以他为学习榜样才下乡的，董加耕听了感慨万千。以后，董加耕成为全国青年标兵和上山下乡知青的学习榜样，与邢燕子同时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

董加耕曾先后当选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地委书记、第三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人大常委、中共盐城县委副

书记。并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组副组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到20世纪的90年代，他是盐城市郊区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多次被评为市、区先进工作者。

## 知青运动在十年“文革”中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无数个家庭卷入其中

10年“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是一股潮水，在领袖人物的极力推动下，迅速汇集成波浪滚滚的洪流。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就像是这股洪流中所发出来的阵阵涛声，是那样猛烈，是那样震撼人心！但洪水退去，风平浪静时，涛声依旧在人们的灵魂中作响，它留下了多少春的幻想，夏的火热，秋的愁落，冬的悲与寒！当世纪过后，留给人们是更多的沉思……




## “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因此而发生了未曾想象到的剧烈变化，曾经按部就班地推行了4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此时也发生了突变，一批批曾经高喊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口号的下乡知青们，揣着几年以来积压在心底的不满情绪，似一股股回头之浪，趁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时机，朝着动荡不安的城市倾泻而来，返城的风潮骤然兴起。

“返城”缘于红卫兵大串联。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引起了临近北大学校的学生的响应。29日夜晚，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在圆明园旧址集会，提出现在应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并秘密组织了红卫兵组织，意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五一六通知》的下发，使成千上万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的中学生，滋生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遵从，对毛

泽东的指示誓死捍卫的狂热心理。在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与讨论中，清华大学附中高年级的一些同学与校方领导发生争执，1966年5月29日晚上，清华附中的学生卜大华、王明、骆小海、张小兵、陶正等，悄悄集会在圆明园废墟上，他们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那样组织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在讨论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建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用“红卫兵”，意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名称确定下来后，他们起草并宣读了《红卫兵誓言》:“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声势浩大的红卫兵组织的创始人，竟是这群年龄在十三岁至十九岁的中学生。1966年5月29日，便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接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冶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学校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组织。

6月1日，毛泽东批准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国上下为之震动。于是，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造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红卫兵组织在京城各校园里蔓延开来，直至全国。

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出现，是非常高兴和满意的。“文革”一




开始他就说过:“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认为:“我们虽然搞了农村斗争、工厂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要来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也深感“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是那么很顺利，阻力不小。于是他决定利用红卫兵的出现来扫除“文革”的障碍。8月18日，重新排定座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了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的百万红卫兵。接着又在同年的9、10月间先后7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1100万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推向顶峰。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革命师生来京，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都由国家财政开支。这就使得红卫兵的大串联得到了合法的地位以及必要的经济担保。

狂热的青年学生们在中央领导人的保护和认可下，他们身穿绿色军装，臂带红色袖章，手捧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的革命歌曲，“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一股不



“文革”初的“造反”知青

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不知疲倦地四处串联，“荡涤着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赃物”，播撒着红卫兵的“造反”火种。

红卫兵的大串联，冲击着各级党政机关，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也因此很难进行下去。许多的下乡知青在红卫兵的感染下，纷纷丢下手中的锄头，披上红色的造反外衣，融入了疯狂的造反行列。据当时在中央安置办公室的同志回忆说，过去接待下乡知青上访的人数，每天少则3、5人，多则也不过7、8人，很少有超过10人以上的，这些人主要是要求解决下乡插队中的生活待遇的具体问题。而此时则大不相同了，下乡知青与红卫兵混在一起，大批大批的返回城镇“闹革命”。当时各地涌向北京的下乡知青就有6、7万人，其中一些人在红卫兵的影响下，成立了各种形式的“造反”组织和“联络站”，鼓动更多的下乡青年回城“造反”。这些回城造反的知

青的心态都不同，很多人是出于对革命的热情，有些人则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因为他们在下乡时饱受当地干部的歧视、迫害，现在是算账的时候了。1966年8、9月间，从广西等地来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首先占领中央安置城市知青下乡办公室，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大量档案流失，公布了处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还相继召开批斗会，对中央安置办的领导人进行批斗。中央安置办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安置办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工作。据这位同志回忆，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而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但在当时对户口实行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返城青年的这种要求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红卫兵运动使得全国陷入一片混乱。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已发出《关于北京市大中学校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和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规定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联。1967年3月19日，中央明文规定停止全国大串联。

红卫兵的大串联停止了，那么，返城的下乡知青和其他来京人员也不应该继续串联和逗留城市。1967年，中央和国务院在三个文件中提到了这个问题：

1月11日，在《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的第三条，就谈到下乡上山的知青返城上访、请愿等等，说："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立即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2月17日，在《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中规定：凡留在外地进行串联、请愿、上访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否则将依法惩办。

10月8日，在《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中又规定了六条处理措施，要求回城的知青返回农村，"革命干部要带头动员子女返回农村"。各单位要把"上山下乡工作当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认真抓紧抓好。要分工负责地处理好下乡工作的问题"。

中央的三个文件下发以后，一些城市红卫兵组织暂时停止了和返城知青联手造反的活动，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大会，还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各地来京"造反派"和上访人员"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至此，返城风波平息。

返城风波的平息，实际上又孕育着一场最汹涌的新的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正如《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一书所说：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他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

……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

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即新红卫兵）……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从1967年10月开始至1968年夏季之间，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只不过国家在对待这件事上采取的是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许多的新闻媒体对此也是给予了大力的宣传。虽然也有数以十万计的大中小学生上山下乡，但它较之庞大的城镇毕业生总数来讲，仍然是不成规模。真正有组织有步骤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6、1967、1968年的“老三届”毕业生开始的。



##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夏，“积淀”了3年的1000多万中学生，齐刷刷地站在了国家领导人的面前。这部分人如何安排，“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城镇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就业。是关

系到刚刚稳定的局面能否保持，因此必须就他们的出路做出尽快地抉择。毛泽东对此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1968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指示中批示道：

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在大学，且在中学。

中央据此，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着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后来人们把这个批示精神简化为“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说是“四个面向”，实质上对于中学毕业生来讲，主要是面向农村，其中“面向边疆”指的是边疆的农村，“面向基层”也指农村的基层,即参加农业生产。而“面向工厂”那只是一句话而已，因为在政治动乱的“文革”时期，一切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都遭到了瘫痪性的损失，整个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企业人浮于事，根本不可能再大量地增加新的职工。各地在贯彻落实“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时，无不把安排的重点放在广阔天地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强调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通知

应用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知识青年"自觉地报名下乡上山，服从国家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对于农业户口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也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产建设。"紧接着，山东、贵州等省市"革委会"都相继就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作了决定。就这样，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全国迅速兴起。

为了尽快解决"老三届"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这时的新闻媒体，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报道骤然增多。1968年五六月份，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等人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大谈其下乡的伟大意义；新的楷模层出不尽，蔡立坚、吴小明等名字由于新闻媒介的宣传而闻名全国。陈勇是北京13中的高中毕业生，也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曾在1938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年仅16岁，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付出了受伤三次的代价，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是陈勇心目中的楷模。小时候，





知识青年在内蒙古

陈勇就有一个伟大志向，长大后也要向父亲那样，做一名解放军战士，可天有不测风云，父母一夜之间成了“靠边站”的走资派，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劳动，参军当兵的梦想破灭了。正在这时，内蒙古的一个农场来北京招工，陈勇觉得这是一个为革命立功的机会来了，便下决心要到祖国的边疆去干一番事业，父母得知后，不同意他的这个决定，因为在他的前面已经有三个哥哥下乡当了知青，按照政策，他是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的，况且家里的奶奶和外婆都需要他的照顾。当时的陈勇是很有对立情绪的，认为这是父母自私，只为自己的私利而置革命事业不顾，你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扔下家庭出来干革命的？怎么？如今轮到自己的儿子就有私心了？一气之下，他给学校的宣传队写了一封信，决心与父母断绝关系，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干一辈子革命。想不到，他冲动之下写的这份公开信被工宣队报到了北京市委，市委把它当成了典型材料，拿到《北京日报》

上发表。一夜之间，陈勇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反潮流英雄。到了内蒙古之后，得到了当地组织的高度重视，不久入了党，当上了农场的副场长。当然几年之后，有一天他收到了他大哥的一封来信，得知在他走后，奶奶和外婆因为没人照顾已经先后去世，父母亲也因为他的那封信中谈及了他们的私心，在干校受到批判，母亲经受不住折磨，也去世了，父亲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已保送回京休养。他很后悔，为自己年轻气盛之后所造成的结果而感到痛心，直到现在每每谈及此事他都懊恼不已。

蔡立坚可以说是“文革”中由一名红卫兵小将转变为下乡知青的典型。1966年大串联时，她刚满18岁，是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中学生。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联，途经山西榆次县黄彩公社杜家山，这地方总共才5户农家，交通不便，非常贫困。看到当地农民困苦生活的情景，蔡立坚心血来潮，当即立下当一辈子农民的誓言，并于1968年的3月真的来到了杜家山。落户后，她被选为副队长，在山村办起了学习班，每天组织村民学习《毛主席语录》，每天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偏僻的小山庄响遍了《东方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嘹亮歌声！”7月4日，《人民日报》专门为她的事迹发表了评论文章《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赞扬她的下乡举动，说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也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

径”。并一再宣称：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

很明显，此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已完全被政治化了，所以，当树典型的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时，或者说在树典型的同时，用政治的强制手段便成了制服不愿下乡上山的中学毕业生的杀手锏。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就公开说过：“我告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当兵，等也是白等。”具体做法是：抓落后典型，组织大家来批判这些不听话的中学毕业生；强制毕业生参加某种学习班，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并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对于那些不愿到农村去的中学毕业生来说，不可能长期处于抵触情绪之中，更不可能长期在社会上闲荡，时间一长，谁都有可能被迫就范。据记载：北京101中学于1968年7月底分配57名到内蒙古插队的任务，到8月底仅完成了7名指标。8月30日，工人宣传队雄赳赳地进入该校，短短几天就取得“辉煌战果”。截至9月18日，报名下乡人数达144人，审批了122人，完成任务214%，其成功的秘诀就是强制。

## 强劲的东风

在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只有毛泽东的话才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时有许多最为流行的革命歌曲就这样唱道：

毛主席的著作向太阳，
字字句句闪金光，
照得战士心里亮，
工作学习有方向！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工夫，
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
只觉得心儿里头热乎乎，
啊！好像那
天空一时下起了及时雨，
小麦芽挂满了露水珠，
毛主席的语录指引了我呀，
我干起了革命劲头足！

的确如此，在那个年代也只有毛泽东的话才管用，人民群众才会听，尤其是要发动一场波及全国城乡的声势浩大的知青下乡运动，非毛泽东亲令不可。于是，一个决定近两千万知青命运的号角吹响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以大字标题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主要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验。全县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688户城镇居民中有191户、995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尽管在这批下放人口中知识青年为数并不多，但《人民日报》却用了很重的笔墨在编者按中突出地宣传了这方面的内容，称：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在这条编者按语中特别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

毛泽东的这个“最新指示”又经当晚的广播电台一播送，迅速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给刚刚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来了一股强劲的东风。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亿万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为题，做了更为热烈的报道：

> 游行队伍、宣传队伍、报喜队伍川流不息。许多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连夜召开会议，认真学习，热烈讨论，并立即制定落实措施。不少地方的“革委会”当晚发出通知，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以“只争朝夕”革命精神，争做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有些地区召开了

几万到十几万人的动员大会，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新高潮……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天津、武汉、济南等城市今天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兴高采烈地奔赴农村安家落户。各城市还有更多的大、中学毕业生即将奔赴农村。许多学校里贴满了学生要求到农村去的大字报、决心书。北京有的学生豪迈地表示：

手捧红书离北京，

立志扎根工农中，

广阔天地炼红心，

忠心绣出宇宙红！

……各地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表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教育知识青年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教导，最热烈地欢迎广大知识青年和城乡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劳动上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尽快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我们一起把农村这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

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几天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全国各地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最新指示”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其他各地大小报纸也纷纷报道了人们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的热烈场景。各城市的红卫兵组织和中学“革委会”等也迅速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战斗动员令”。

在欢呼“最新指示”的浩大声势中，人们对上山下乡的疑虑、不满、抵触及各种阻力似乎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如前所说，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要坚决而发自内心地执行。

“最新指示”一发表，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立即被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仅1969年1、2月间，全国就有155.6万人下乡落户，其中河南32.9万人，湖南20.1万人，四川16万人，湖北13.5万人。到同年的5月初，《人民日报》就炫耀起来：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南京、郑州、南昌、长春、杭州、合肥、西安、长沙、武汉、广州、成都等大中城市，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都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年下乡知识青年的几倍、几十倍。全国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共有数百万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如今，我国每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农场、牧场、林场，都有了在那里安家落户、同工农群众并肩战斗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破天



插队落户到村

荒的伟大创举，揭开了我国青年运动史的新篇章。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重大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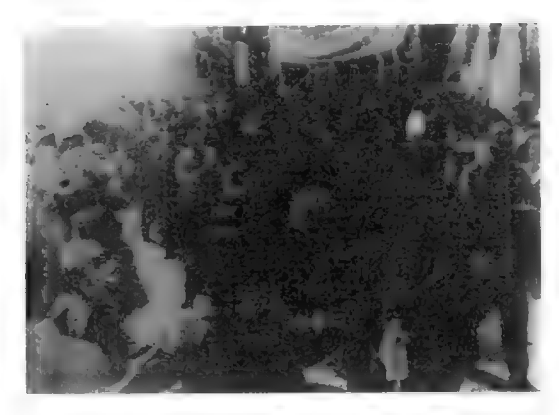
至此，“老三届”毕业生已基本离城下乡，69届的应届毕业生也已动员下去了一部分，辽宁、黑龙江等省出现“老三届”毕业生按学校班组建制整班下乡的“一片红”喜人局面。到1969年年底，全国下乡的知青共达267.38万人，加上1967、1968年下乡人数，总数达467万多人，其中到国有农场的80多万人，到人民公社插队的387万多人。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来势之猛，是自1955年以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最。

## 高级领导干部送子务农

在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号召下，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展得生机勃勃，一批又一批虔诚天真的中学生，在狂热的口号声中，争先恐后地奔向广大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差距，理性与冲动总是一种矛盾。当绝大多数的热血青年冲向祖国的边疆和农村时，也有不少城市青年有抵触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与当时我国的政策时紧时松和不稳定性有关。

中央在制定下乡青年的政策时，是要顾及方方面面的，既要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且要办得轰轰烈烈，又要兼顾到某些具体的实际情况，比如残疾人和身体确实不好的人以及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照顾的人必须留在城里。可就是这些特殊的政策往往制约了上山下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1970年到1972年的3年时间里，政策规定只要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孩子下乡，其余的都可以留在城里。到了1973年，中央的政策又变了，即无论家庭的孩子有多少，都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城里，有的地方甚至连独生子女都要求下乡。

政策对一般的家庭来说，谁去谁留主要是根据其政策背景和青年的特长及成分来决定的。政策背景指的就是政治背景，



南京知青赴西藏插队

即家庭成分，出身好的，本人表现不错，是团员或党员的，则可享受政策照顾，他们可以在农村锻炼一段时间之后由群众推荐，或进大学深造或进城参加工作，相反，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则没有任何理由可照顾，毫无理由地被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以此来脱胎换骨，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校学习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在“文革”以前，有可能被照顾上大学深造，“文革”以后则不同，学习成绩再好，只要你家庭出身不好，你的唯一出路就是到农村去。反过来，即使是学业很差的毕业生，只要你根正苗红，都可能被保送上大学，“白卷先生”不大有人在吗？当年有部电影叫《共大花开》，一位几乎一字不识的苦大仇深的农妇，把她刚刚学会的一句话——“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写在一张白纸上，就被录

取上了“共大”（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而那位满脑子“马尾巴功能”的老教授却被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都是那个年代闹出的笑话。

正因为政策的不合理性和不确定性，给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来难度，走关系、搞特殊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某些掌握着地方权力的领导者，总是利用手中的特权搞特殊的照顾。据《人民日报》报道，江西某县委书记的女儿高中毕业后，某单位的掌权人借口考虑到她的文艺特长和爱好，把她招进本单位从事文化工作，只是当这个县委书记知道后，认为自己的子女不能搞特殊才没有得逞，后来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也被送到了农村接受“再教育”去了。

当时在甘肃兰州的传媒就有这样的报道：

> 有的干部做得太离谱，以致利用他们的职务之便，或各种关系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城里，或将他们从农村抽调回城。

安徽合肥有位领导人曾经公开地说：曾有一段时间，合肥市的一些干部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参与了不健康的“开后门”活动，在教育青年人到农村去的问题上，我从来不搞任人唯亲，不论谁来说好话都不行。

从这些报道中，就可见当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不正之风是很盛行的。

当然，大多数领导干部还是起到了表率作用。有的领导人，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为了自己制定的政策能全面贯彻执行，把自己的子女，哪怕是按政策可以留在身边的子女，送到农村去，其目的就是起带头作用，为全国人民树立一个榜样。

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生前身边虽无一个儿女，但他对上山下乡工作身体力行，他勉励侄女周秉健下乡务农建设祖国的边疆曾被传为佳话。1969年，周秉健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在牧区，她艰苦努力，与牧民们打成一片，得到了当地牧民的一致好评。1970年，她在群众的推荐下，报名应征，并获批准，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当兵是她从小的愿望，现在，多年的愿望已经实现，她心里自然很高兴，便将喜讯写信告诉了伯伯、伯母。1971年的元旦，她穿着新军装，兴高采烈地回北京见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伯母。不料，一进门，就听周恩来冲她说：

“秉健啦，你还是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去吧。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

原来周恩来早就知道秉健当兵的事情，他还曾派秘书到部队去了解情况，看她是否利用了特殊的关系，参军的手续是否

正常。她见秉健有些不理解，便耐心却又严肃地对她说：

“秉健，你参军的手续是符合正常，没有走后门。但是你想想，草原上那么多人里面只挑了你一个，还不是看在我和你伯母的面子上吗？我们不能搞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农、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嘛！”

事后，周恩来还让邓颖超出面告诉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让他们一定把秉健送回草原。

部队的领导还是想把周秉健留在部队里，以为拖一两个月之后，周恩来也就没有时间来过问这件事了。可没想到，周恩来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他严肃地对有关部队领导说：“你们再不把孩子送回去，我就要下命令了！”

这样，部队领导才无可奈何地同意让周秉健回到内蒙古草原。1971年4月，秉健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高兴地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

高级领导干部送子务农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早在1963年《中国青年》第23期上就有报道：“（在知青中），有元帅的孙女，有将军、老红军、部长、省长、市长、市委书记的子女，有‘革命妈妈’陶承同志的孙女。”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更多了，最著名的有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送儿子董良翮下乡，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鼓励儿子万伯翱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支持女儿下乡，等等。




在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的热潮中，各级领导干部送子女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范例数不胜数。在广东惠阳地区，就有这么一位革命家长，他的儿子分配在工厂，他偏要把儿子送回老家陕西省合阳县的乡下；他的女儿身体有病，组织上决定留在城市分配，他却鼓励女儿到新开发的农场去锻炼；家里的小女儿还没有毕业，他却已经对她进行了务农的思想教育。他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自己、对孩子要求特别严格。这就是时任中共惠阳地委书记的党向民。其实当时的惠阳地区“革委会”在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中，就把干部带头放在第一位，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表示要坚持带头学，带头用，带头送子女下乡，做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

不仅地方领导干部是这样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的军队干部也都是执行毛泽东“最新指示”不动摇。197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做教子女务农的模范》的小册子，其中有篇新华社通讯员的文章《让孩子走进光明大道——记江苏省军区某师政治部副主任王健送子女下乡的事迹》，就是介绍军队干部是怎样送子女务农的。文章的开头就说：

> 江苏省军区某师政治部副主任王健，几年来先后送了三个子女下乡务农。三个孩子在农村三大革命实践中磨炼，进步很快，都已经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 每当人们赞扬王健和她的老伴田树娥"教子有方"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不是我们有能耐，全靠毛主席为青年指引了革命路啊！"

文章接着介绍了王健送子女下乡的几件事：1968年，王健的第二个儿子参军以后（大儿子已经下乡），第三个儿子志贞高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了洪泽县万集公社插队落户。这地方的自然条件比较差，但是贫下中农有志气，条件越差越要大干。冬天，天上飘着雪花，水里结着冰碴，社员大搞积肥、整地，到处热气腾腾。志贞跟社员一起干了一个冬天，终于病倒了，回到南京治疗和休息。在父母亲的细心照料下，他的病很快就好了，父母亲盼望他早日康复回农村。可过去了好多天，儿子一点也没有回去的意思。王健便悄悄对老伴说："我看小三不想走了。"老伴听了，有点埋怨起来："你只知道让孩子走，和他一块下去的同学有的早就回来了。别人在议论他，说爸爸老实，儿子吃亏。"王健听了，冷冷一笑，说："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老老实实，决不能搞歪门邪道。"接着他又对老伴说："谁家父母不疼儿女？就看怎么疼法。孩子年轻，在农村吃了点苦，又闹了场病，正是思想容易波动的时候，现在要是过分宠他，使他恋家，不想回去，离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正确轨道，那就把孩子宠坏了。这不是爱孩子，是害孩子。"老

伴觉得有道理，也就没做声了。后来王健找到儿子谈心，他给儿子讲战争年代的事，并说："打仗，哪有不流血的？劳动，哪有不流汗的？干革命就得能吃苦。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富强起来，就必须继续艰苦奋斗。"听了父亲的这番苦口婆心的话，抬头再看看鬓发苍白的父亲，志贞眼泪汪汪，心里像开锅的水一样翻滚。他激动地对父亲说："在农村，贫下中农关心我进步；在家里，亲人教育我成长，我一定向前辈学习，做革命的好后代！"就这样，志贞愉快地返回了农村。

事实上，在当时就连一般的党员干部和退休老红军都无一例外地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做教子女下乡务农的促进派和带头模范。在这本小册子里，就介绍了几个典型人物：《教女儿在农村安家落户——记共产党员李艺林夫妇》、《"让他们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湖北大悟县退休老红军送子女下乡纪事》，以及辽宁省抚顺市新抚钢厂化验室党支部书记吴世昌写的《"女儿走的路正，我一百个支持"》、长沙市化工机械厂干部邓湘雄写的《喜看女儿在农村茁壮成长》、天津东门里小学教师桂淑慧写的《我为什么要把四个孩子送下乡》，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在上山下乡这场伟大的

社会主义革命中，起到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是把子女放在自己身边，还是交给党来安排？这是用私有观念的“父母之爱”腐蚀子女，还是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教育子女的原则问题，也是反映一个干部有没有无产阶级党性的重要方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子女是社会的一员，是属于人民的，是整个国家的财富，绝不应该把他们当做个人的私有财产。要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得有个统一计划，有个革命分工。如果像有的干部那样，只想把子女留在城里工作，不愿送子女下乡务农，那城里人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从什么地方来？三大差别咋能消灭？共产主义又咋能实现？现在，有许多工人子女发出豪言壮语：“一生交给党安排”，“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扎根边疆干革命，青春献给新农村”。作为一个革命干部，就要学习和支持青年们这种可贵的革命热情，教育自己的子女模范地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不要为他们挑挑拣拣，更不要搞那些不正之风。

总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加速我国农业的前进步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党和毛泽东交给

广大贫下中农、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光荣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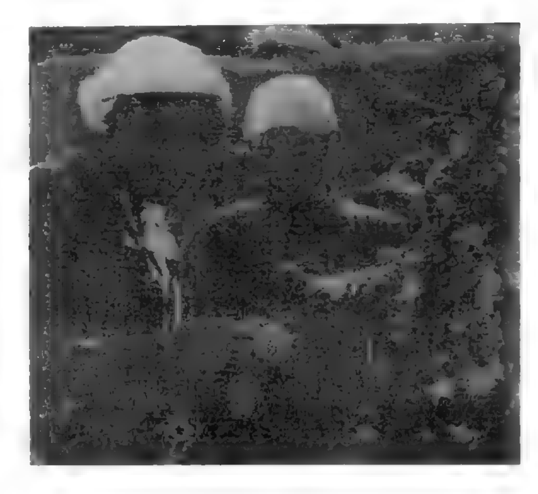
其实，在那个年代，身为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子弟，有时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父辈们做出的牺牲，他们中有的确实是经过“文革”的思想洗礼而发自内心地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无奈。例如，在安徽合肥市，有一家工厂的职工子女在毛泽东“最新指示”发出以后很久，还未见有下乡去的，后来一调查，发现这个厂的领导的子女没有一个带头的，所以职工都在等待观望。于是，上级领导找到这个厂的领导谈话，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这几位厂领导不得不在职工大会上做深刻的检讨，并立即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不留全部下放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了。由于厂领导做出了表率，这个厂的上山下乡工作一反以前的沉寂，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后来还被作为典型在全省宣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安徽省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展。

这是高干子弟中素质最高的一批人。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在自觉地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准备，他们相信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要能吃苦，要与人民打成一片，虽然他们最终的目标远不是到此为止。

# “贫下中农的光荣职责”

毛泽东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是给“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公开发出的最直接的上山下乡动员令，它明确提出了上山下乡的对象与目的，并强调提出“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都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把上山下乡运动的基调基本定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点上。知识青年再不像50年代那样慷慨激昂的高喊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到广阔天地的农村去大有作为，而且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个“再教育”理论，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是与党内“左”倾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57年，随着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左”的思潮在党内更加猖獗，知识分子的地位急转直下。7月份，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是这样谈到知识分子的：“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他还警告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



向老农学艺

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

到了“文革”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一致看法，不管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还是新社会经过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也不管你是大的，或是小的，更不管你是真正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还是半桶水的自称有知识的假知识分子，统统都是“知识分子”，统统都是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的对象。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有这样一段论述，他是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来评价的：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明朝皇帝有两个出色的，一个是太祖，是个文盲，识字不多；一个是成祖，是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以后到了万历、嘉靖两帝，读了很多书，

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是害人的事。

如此可见，“再教育”是急不可待的头等大事了。1968年的《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编者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称：

>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

同期的《红旗》杂志又一篇调查报告里征引了毛泽东的另一段批示：

>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那么，为什么叫“再教育”呢？1968年9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中就“再教育”




的含义作了专门的阐述，文章说：

> 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毛泽东的前两个批示中所提到的“再教育”的对象是已经毕业并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但没有明确指正在毕业将要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所以到了12月，毛泽东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就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明确为即将毕业的初中、高中、大学生，而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则成了青年学生的必经之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成了一场接受“再教育”的运动。相比之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此时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

为了大造“再教育”运动的声势，以减轻国家所面临的城市中沉重的就业压力，使更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为《带好知识青年是贫下中农的光荣职责》，文章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知青代表赴大寨“取经”

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需要”。所以带好知识青年是贫下中农的光荣任务和神圣职责，决不能嫌麻烦，当负担：

> 带好知识青年，首要的是帮助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感情。
>
> 带好知识青年，就是要帮助知识青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




的大革命运动中努力锻炼、改造自己，通过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使他们彻底转变旧思想，爱贫下中农所爱，恨贫下中农所恨，真正在思想感情上，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知识青年要牢记毛主席“你要群众了解你，你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的教导，作长期的痛苦磨炼的思想准备，老老实实地拜贫下中农为师，恭恭敬敬地向工农学习，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广阔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天地里锻炼成长。

在实际操作中，贫下中农则采取“三结合”的办法来进行，即在大队干部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有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代表参加的“再教育”领导小组。吸收知青代表参加的目的，是因为这些知青代表在当地知青中有一定的威信，可以通过他们来了解知青的思想活动情况；吸收下放干部代表参加，目的是想借助他们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当然，知识青年来到农村以后，接受再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各种政治活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报刊和广播的宣扬报道，定期印发学习材料、参加生产劳动等等。



上山下乡知青服务专柜

1969年2月2日，《人民日报》的“工农兵论坛”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贫下中农的光荣任务》，文章将再教育的重点主要归纳为四点：一是帮助知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对知青进行阶级教育；三是对知青进行两路线斗争教育；四是抓好思想，随时掌握知青的思想动向，帮助他们彻底改变旧思想。所以，当成千上万的知青头上擎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口里仍然喊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来到他们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贫下中农面前的时候，他们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今昔对比、忆苦思甜，接下来就是学习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然后就是讲“三史”（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开“三会”（讲用会、报告会、谈心会），并把它制度化。

## “再教育”下的典型

在如此这般再教育的标准下，一批时代的精英应运而生，金训华、张勇就是其中两个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应该还记得，“文革”期间的第一枚以知青为题材的邮票，就是一幅金训华在激流中搏斗的美术作品；也应该听说过《理想之歌》这首诗，诗中曾这样赞颂着他们：

马蹄破冰川，

套杆劈风墙，

“宝贵青春献人民。”

——那是我们的张勇啊，

舍生忘死

救群羊！

气盖双河浪，

壮歌震北疆，

“活着就要拼命干，

一生献给毛主席！”

——那是我们的金训华啊，

化作雄鹰

云里翔！

“跟上来呵！”

——英雄在召唤；

“我们来了！”

——回答声响彻

岭南、塞北、海岛、边疆。

千万个金训华、张勇在战斗，

千万个金训华、张勇在成长！

金训华，出身于上海市的一个工人家庭，高中时就读于吴淞第二中学，是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子，即上海市中学红代会的核心人物之一。1968年高中毕业，在家继续参加了学校的“闹革命”。1969年5月，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带领妹妹金士英和一批上海知青风尘仆仆到东北边疆的黑龙江省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3个月以后，他为了抢救国家物资（两根电线杆），在一场特大山洪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后来，他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员。

张勇，有着与金训华同样的“革命”经历，只不过她是女英雄，也是出身工人家庭，初中时，就是天津市中学红代会河西区的常委。1968年底，她初中毕业，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带头报名到农村去。1969年4月，她满怀着革命豪情来到了黑



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

龙江省呼伦贝尔大草原——新巴尔虎右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尔敦乌拉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队插队落户，1970年6月3日，为抢救生产队的落水羊群而英勇牺牲。后来也被追认为共产党党员。

很明显，两个典型人物走的都是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的道路，也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叹的是，作为红卫兵的他们，曾经在“文革”中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小闯将”，在天安门城楼前曾接受过毛主席的多次检阅；而作为知青的他们，却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品，必须经过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方能成为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那个动荡不安、

颠倒黑白的年代，是是非非飘浮不定，一代充满朝气的青年人不得不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否则，便是对“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极大不忠。听听他俩的铮铮誓言：

“无限忠于毛主席！”（金训华）

“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

“每说一句话，就想想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每走一步路，就看看是否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会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染上修正主义毒素，必须长期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磨炼。”

“让毛泽东思想统帅自己的每一根神经！”（张勇）

“拼死拼活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要彻底改造世界观，找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根源，彻底地亮，彻底地斗，认真地改，坚决地改。”

“生命宝贵属人民，誓将青春献人民！”

哪一句誓言不充满着他们对领袖的忠诚？它几乎是那个时代统一化了的豪言壮语，也是接受“再教育”之后的一种格式

化了的思维。一位当年的内蒙古知青在她的日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一次她去井台打水，不小心将挂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掉在了车辙沟里，待到她打水回家后才发现，转回去找就再也不见了。晚上，她在日记里追悔莫及，“竟然忘了躺在车辙沟里的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反复自责，并反省了自己对领袖的不忠，表示今后一定要“天天斗私，天天批修”。又一次，她回家探亲，偶尔间她对她的一位同学的哥哥产生了一种朦胧的爱，这对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来讲应该是很正常的感情外露，可她对此惶惑不安，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她在日记中写道：“长此下去，是不是会离开毛主席革命路线越来越远呢？”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上有篇报道，说：天津延安中学的下乡知青在学习了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马上就付诸行动。有一天，育新公社新立屯大队一个在“四清”中下台的干部派她的女儿给6个女同学送去6个煮玉米，这个队落户的知青立即向生产队做了汇报。他们说：“这不是6个玉米，是阶级敌人射来的6发糖衣炮弹。”于是，他们手擎着红色宝书，排起整齐的队伍，找到那个坏蛋的家门，宣读了毛主席的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真是可悲、可叹、可怜！

难怪，就连当时几乎一手遮天的“女皇”江青在得知金训华的事迹之后非常感兴趣，立即打电话给黑龙江省“革委会”，要求把金训华的所有材料连夜派飞机送到北京，并亲自指示《红旗》杂志在当年的第12期上发表了金训华的日记摘要和评论员的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从而在全国掀起一个向金训华学习的高潮。

# 知青运动出现了问题，李庆霖告“御状”，毛泽东写回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召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带去了文化，为建设农村，开展振兴祖国的内地和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不少人在艰苦环境中也得到了锻炼，但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1968、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之后，1970年则开始大滑坡，当年全国共有106.4万人下乡，仅相当于上年人数的39.8%；接下来的1971年减至74.8万人，相当于1969年的28%；再下一年再减至67.4万人，只及1969年的25.1%，几乎跌入谷底。

这是“再教育”必然出现的后果。从当时全国各地的调查情况来看，这几年来，农村和农场等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妥善安置了大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进步很快，入团、入党的人数激增，还有一些知识青年被提拔为基层干部。但真正的事实远不是如此，只不过在当时，知识青年所面临的困境被人为拔高的宣传效果所遮掩了，更为严重的是摧残知青的事件在各地屡屡发生。中央虽三令五申要制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但下面具体的执行者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下乡知青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出现了外逃的现象。上山下乡工作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 一份“情况反映”

据《北京日报》社1973年2月28日《内部参考》上的一则消息称：

> 据对北京5个中学、10个班级共478名学生的调查，准备下乡的只有78名，占总数的16%；表示“坚决不插队”的91名，占19%；犹豫观望的311名，占了65%。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看了此份参考之后，立即批示把它印发给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并要求各地重视知青工作。批示说：

上山下乡工作是多么艰苦的群众工作。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应知道这点。对于上山下乡知青管理教育工作不重视，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让那些奸污知识青年违法乱纪行为继续存在，而不加处理，或处理不当，即是姑息养奸行为。

他在103号《参阅文件》上又批示：

各省、市、区要把这个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关心上山下乡青年，一推了之是不对的。要经常抓，要经常督促。这份《国内动态清样》所提出的问题，望省、市、区特别注意。

那么，当时在知青问题上究竟存在哪些严重的问题呢？根据1973年6月22日到8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仅摘其要点转述）：

一、各级领导对知青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管理不善，甚

至是管理粗暴；

二、少数知青在生产生活上存在着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全国有1/3的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有40%的青年住房没有解决；

三、任人唯亲，“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走后门”十分严重；

四、摧残迫害下乡知青，特别是奸污女知青的案件相当严重；

五、青年的思想极不稳定。当时在知青中由于生活所迫不仅外逃的现象很多，且自杀的现象也相当严重。

会议期间，一份《情况反映》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震惊。这份材料是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两位记者向国务院写的报告材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存在严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现象：

> 以种植橡胶为主的四师十八团，70%以上的人员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识青年。这个团的部分领导人，对有缺点、错误的知青不是坚持正面教育，而是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镇压。据1972年4月统计，十八团30个单位，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识青年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例如：背

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夏天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被吊打的知青，绝大多数仅是有骂人、打架、小偷小摸、不服管理、劳动偷懒等缺点、错误，还有的人仅是看到干部吊打别人，说一句批评的话而被吊打的。团里一些领导，有的亲自批准搞轮流批斗（实际就是捆绑吊打）；有的公然声称："只要不打死就行"、"要捆就捆紧一点"；有的赤膊上阵，亲自拳打脚踢……该团九连批判一个知识青年，没有捆绑吊打，团副参谋长看了很不满意，指责他们说："你们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要重搞！"在这些团领导的指使纵容下，基层干部和少数工人违法乱纪，任意迫害知识青年。该团基建连的一位知青，由于打群架，接连被捆12天，被吊打17次，用铁丝捆了5个晚上，有时被吊在空中往墙上撞，有时吊起来再用杠子往下压，受了7、8种刑法，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造成长期腰痛，大小便不正常，一度被逼得要自杀。六连一位知青被怀疑偷了军装，连长、指导员集合全连对他进行吊打，逼他交出军装，他交不出来就打得更厉害。这位知青直向连长、指导员喊："叔叔救救我，救救我！"连长、指导员不但不理，反而唆使一些人打得更厉害。有些连干部随身带着绳子，




对谁稍不如意就说:“我代表党支部把你捆起来!”六连一些知青拉肚子，出勤较低，连指导员说:“你们不劳动，把你们拿到太阳下晒!”于是硬逼着6、7个病号在摄氏40度的阳光下站着，并且要面对太阳，不得擅自走开。

**而在知青受迫害的问题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女知青被凌辱、奸污的案件。这份材料对上也有反映:**

十八团卫生队长孙涛，奸污女知青11人，其中3人堕胎，占卫生队女知青的半数以上。二十连的指导员李文峰奸污、调戏、猥亵女知青15人，致使两名女知青跳河自杀未遂。臭名昭彰的一师二团六营二连连长张国亮（有称张国良）在1970年3月到翌年2月的近一年中，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3人，强奸未遂1人，猥亵17人。某女知青病休昏睡被强奸后，经常痛苦昏倒，几次双目失明，一度神经错乱，见到人就恐怖得大喊:“妈妈、姐姐，快救我!”某女知青被强奸后精神失常，多次拿着割胶刀和绳子往山林里跑，想自杀。张无恶不作，有恃无恐，以至一些女知青深夜听见老鼠声，都会吓得惊叫:“张国亮来了!”全连人心惶惶。

7月5日，叶剑英看了这份《情况反映》之后，批示说：

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

7月6日，周恩来怒批：

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

李先念也在材料上批示：

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李先念还愤怒地对下面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说：

张国良那个连长，和日本鬼子差不多，弄得知青听见老鼠跑，都喊连长来了。你还把他当干部，处理

不下去？下不了手，这是为什么？他对知青那样残忍，可是处理时，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处理不下去，上面对这些采取包庇原谅，这是什么问题？……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下，张国亮终于被绳之以法。

## 李庆霖告“御状”

然而，在“文革”时期，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许多政令不通，一些造反派掌权的地方更是阳奉阴违，把中央的指示当成耳边风，我行我素。有的地方对知青的摧残迫害依然成风。知青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1972年底，福建省的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封反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的窘迫与艰难的生活情况的信，算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壮起胆子告“御状”的人，这在全国引起轰动。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下林小学的一位老师，他的儿子李良模是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下放到本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便于1972年12月20日上书毛泽东。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分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钱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放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

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他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如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

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年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之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

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这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的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信是寄出去了，可李庆霖的心却忐忑不安，他担心这封信无法送到毛主席的手里，即使送到了，毛主席也不可能有时间回信。再加上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莆田县城内发生了一起知识青年因在大街上以匿名贴大字报攻击上山下乡运动，而后被抓起来狠狠批斗的事件，李庆霖担心上书的事一旦被造反派知道，不但自己挨批，连儿子在乡下的日子会更加雪上加霜。4个月过去了，1973年5月6日，出乎意料，他收到了毛泽东于4月25日写的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的回信寄到莆田县时，有人欢喜有人愁。下乡知青及邻里人得知这个喜讯之后都兴奋不已，奔走相告，许多人还激动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但是莆田县民事组和李良模插队所在的荻芦公社某些知青工作的领导干部却不那么高兴，因李的信中揭了他们的短，他们不得不对李和李的一家耿耿于怀。李庆霖的一家受到了当地的群起攻击。好在毛泽东并没有忘记

李庆霖，在寄出回信不久，他老人家就向中央负责上山下乡的领导人指示说：查一查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可否让他参加党的十大，如果不是，看本人是否有入党要求，如果有，可批准他入党，如果没有，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的上书编入课本。

李庆霖当时是个被迫打成的“右派分子”，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向上级申诉要求平反，但未果。是毛泽东的亲自过问才使他积蕴多年的不白之冤得以洗刷。以后他因此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也算是平步青云。

## 不要再让主席操心了

在李庆霖告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研究。1973年6月至8月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还是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即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次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等，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总理在传达毛泽东的复信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项

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

在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之后，周恩来就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医疗、婚姻、归侨安置、成分、知青布局、表彰知青先进事迹、学习、教育以及打击坏人、干部带队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农林部军代表沙风负责，迅速抽调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得力干部70多人，组成13个调查组，于5月份分赴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陕西、河北、湖南、陕西、云南、福建、安徽等省、自治区，调查了解知青上山下乡情况，为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作准备。

各调查组所采用的调查方法都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解剖一两只麻雀”的方法，选择若干个好的或坏的点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然后结合当地部门提供的相关材料，得以基本认识。5月下旬，各路调查组回京参加汇报，研究分析各地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方案。

6月10日，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复信”的《中央通知》（即中发［1973］21号），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经毛泽东圈阅后发至各地。随同下发的还有《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复信，并认真讨论中央调查组提出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准备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

对于“文革”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次全国会议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从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来讲，对这次会议基本满意，因为它提出了六条统筹解决的措施：

严格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加强领导；

切实解决口粮、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大力加强对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

坚决刹住“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发动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的斗争。

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做出长远的全面的安置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同时还提出了四种安置方式：一是建立青年点，集中插队，有条件的可以回老家落户；二是建立以下乡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青年队，集中劳动和管理；三是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建立单纯以下乡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农场；四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

# 知青运动急剧收缩，全国各地刮起知青返城大风潮

70年代以后，开始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回到城市。到70年代后期，知青们通过多种形式的抗争要求回城。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 “知青工作很复杂”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就指出，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是邓小平，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

为何走不通了？首先就是农民对知青不满意。我国人口本来就有80%在农村，“文革”中，农村人口每年以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土地每年则以582万亩的速度递减。农民已经感到劳动力过剩了，再让他无条件地安置城镇青年，形成知识青年与农民抢饭吃的恶劣局面，他们会真心欢迎知青吗？

其次就是知青本人和其家庭的不满意。从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中便可看出。

再次就是城镇对口单位的不满意。动员知青下乡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政府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做好本单位职工的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乡，还要抽调得力干部为带队干部带领知青下乡，并要抽出资金、物质或技术力量，无偿支援对口安置地区，无疑使各企事业单位不堪重负。

最后是政府也不满意。每年政府要花一大笔经费来安置知青下乡，特别是1973年起提高安置经费标准后，国家财政平均每年拨款8.2亿元。如此高额拨款，不仅未能让知青安心在农村，

而且还不能使各方面满意。有人戏称:国家花了70亿,买了个“四不满意”。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经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步履艰难地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企盼对这一运动的归去有个合理的说法与解决的办法。就连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此也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香港大公报》评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右派昭雪，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这一系列政策无疑深得人心。但是中共政府面前还有许多遗留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紧迫也最棘手的当数现在仍在农村的1000万上山下乡知青的就业问题……”

《东京时报》报道:“……1000万知青是一座火山口，消除火山威胁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就业。但是目前中国政府的经济状况,就业与失业几乎说是一个同义语……他们正坐在这座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

美国《远东评论》称:“……从地理位置上看，黑龙江省与另一个敌对的社会主义集团毗邻，昔日沙俄帝国的阴影时刻在北方边界游荡。该省约有100万知青，他们对政策积郁的不满将直接导致北方防线的崩溃……可以预言，中国政府的……知青政策很大程度

上将从北方知青的动荡中打开缺口……”

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忙于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解决知青问题还未来得及提上议事日程。况且对如何解决知青问题，上上下下还需要有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为了统一认识，筹备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顾秀莲主持，采取只出题、不回答的方式，主要听取地方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永贵等接见了与会代表，李先念、陈永贵等还在会上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

但是，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议论颇多。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这样的顺口溜，说：打倒“四人帮”，知青不下乡；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还有的知青说：过去表示到农村去扎根，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青年此时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有的知青先进典型或先进集体也开始把挂在墙上的奖状和锦旗摘了下来。社会上

还有这样的议论："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有的说：现在矛盾集中，弄不清上面的精神，说服不了下面的群众，左右为难。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反映到了座谈会上，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计的问题："四人帮"插手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还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而对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还要不要提的问题，也是众说不一。还有的人简直是大胆之至，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个"怪胎"。

座谈会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要不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

二是招工政策引起的思想波动，有的地方传说今后国家不从下乡知青中招工了，致使许多知青不满，认为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吃亏了；有的知青点干脆把饭锅门窗给砸了，要找社队干部算账去；还有的回城集体上访。

三是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有的地方一提起知青就认为都是"长刺长角"的，一说整顿知青，就想整青年。

四是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

对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当时从领导思想到社会舆论，对知青问题的看法都很难拿出有把握的分析来。一些领导人也不敢贸然表态，当时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都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不管怎样，当时的知青政策还是如陈永贵所说："当前的知青工作很复杂，不会有大的变动，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大家不要泄气，要鼓劲，把知青工作抓上去。这个工作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安排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人们的思维方式还没有从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就只能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的"怪胎论"也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厉批评。

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进行了报道，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文章指出：

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一批又一批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与工农

相结合的道路。这对于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知青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成绩很大。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文革”以来的“再教育”运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77年的年末，各地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71.6万人，在乡的下乡知青还有863.8万人。

## “上山下乡农民不欢迎”

在云南边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如傣族、哈尼族等，他们同解放军的关系比较好，但是他们并不爱知青。确实，知青也没有什么可爱的：不是满头乱发，就是剃光“白沙”（光头），一副狰狞的模样，加上偷鸡摸狗，甚至强买东西，谁喜欢？另外，当时知青农场的开荒给西双版纳的环境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毁林开荒动辄是“万亩大会战”，几个山头一推而光；然后是烧




岜（烧荒），火光冲天而起，惊天地而泣鬼神，怎不天怨人怒！70年代有两次特大寒潮，当地居民从来没有经历过，气得破口大骂知青，说这些寒气都是你们带来的。

真正把知青问题纳入到城镇就业轨道上来的是邓小平。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主张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且在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会议上，宣告了“文革”正式结束，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错误口号的影响，没能及时纠正“文革”中在知青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虽然在1978年以前知青问题经过几次大的调查研究，但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来看，这个禁区依然如故，没敢突破。

1978年3月28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 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邓小平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知青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体现了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亲自主持定稿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引导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在这场讨论中，上山下乡这一禁忌话题第一次被理论界破除。于光远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直截了当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应该承认这是十多年错误做法造成的。邢愤思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报告中也说：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要花10多亿元，包括各种各样的补助、耗费，花这么多钱，结果到了农村还跟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

理论界的这些犀利的抨击，在社会上激起层层波澜，特别在知青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11月份，一名已经返城的北京知青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迎接祖国美好的春天》，大字报主要就"文革"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经济规律是一客观的规律。对于经济规律的遵守与否，是检验一个革命者是否承认实践第一的试金石。

人们还记得12年前震撼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吧？……这个上山下乡运动，说近了，是国家经济衰退，不得已安排劳动力的权宜之计；说远了，是对历史进程，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倒行逆施。

了解一些历史发展的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伴随着农民的大量破产而前进的。我们的教科书上把这一发展说成是对农民、对历史的犯罪。但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来看，这只是产妇临产之前不可避免的阵痛。资本主义这个婴儿正式在这一阵痛之后脱胎于母腹——封建社会。当然，我们不会走让农民破产的老路。然而，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是经济规律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提高工业化水平，加强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大量劳动力，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违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因为我当过知识青年，谈这点认识。

11月23日，被“文革”禁锢了长达10年之久、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关于知青问题的大讨论推向了高潮。它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第一次把知青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世人面前。

显然，这次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正是基于邓小平把上山下乡纳人城镇就业轨道这一设想，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解决知青工作问题有了正确的方向。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对许世平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渐减少下乡，以致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你们的责任是讲明这种可能性。知青安置去向，要主要着眼于城市。建议你们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但仍要下去一些人，下去要改进方法，少搞分散插队，多搞集体安置。

7月19日，华国锋也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提出：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7月4日至10日，国务院知青办召集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了城市如何广开门路、逐步做到多留少下的问题。三市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 中央三次会议

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国务院知青办还于1978年7月20日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为即将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确立了基调。

10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之前之后，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有过三次深入的讨论。

第一次：

9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召集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共青团中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方针问题。

纪登奎说：总的方针是要稳住。要考虑逐步做到不搞上山下乡的提法。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也会给下边造成困难。农场要稳住，这也是个方针。

李先念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不然，“四不满意”，国家每年还要花20个亿。

第二次：

10月9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为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报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

李先念说：对过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不然就乱了套。

当汇报到上山下乡种种主张时，李先念说：轮换制最糟糕，花钱最多，两年回来还得安排。过去把青年统统搞下去，对不对？我看不对，管得多了，不管什么人都搞下去。今后要集中管好190个大城市，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

纪登奎说：现在下面都在等，到了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解决会造成大问题。方针要坚持，政策要调整，要使青年、家长都满意。

康世恩说：过去上山下乡的办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

胡乔木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口号不完全，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是去就业就要研究上山下乡的就业问题。如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妥，那么多农民不能建设？农村也不缺劳动力。上山下乡实际是过渡的，不能说没有目的，至少没有归宿。如果把插队作为就业来处理，在群众中通不过。

解决这个问题要同教育配合起来，多数人不能升大学，所以就得有就业教育。

第三次：

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

华国锋说：国有农场潜力很大，但我们这套管理办法不好。南斯拉夫的"贝科倍"搞农工商联合企业，发展小城镇，可以学。

邓小平说：《汇报提纲》提出的方针比较适宜，有利于安定。现在下乡路子越走越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例如"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在大队住、食、学习，分散在小队劳动）的点，可否想办法搞成卫星城镇。北京的轻工业比较薄弱，要研究新的行业。新的领域，要走出一条路来。

李先念说：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对于过去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要不然，800万人闹市谁受得了呀！插队的也要肯定成绩。但今后要改变办法，"三集中一分散"的办法我不放心……广开门路，可以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把服务行业统筹安排好。

叶剑英说：要因地制宜找出路。要注意提高青年的科学文化技术，城乡都要想办法。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办法要多一点。要想办法发展社队工副业，发展卫星城市，插队的要缩小。

纪登奎说：知识青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现

在城里的不想下去，农村的800万都想回来。都待在城里没有事做，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搞好了是积极因素，搞不好是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五七”干校已经轮训了三遍，搞不下去了，可以组织办农场安置知识青年。

此外，还有聂荣臻、乌兰夫、韦国清、倪志福等也在会上作了发言。

经过几轮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讨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以便统筹解决知青问题。

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16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性的会议。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实行规定》。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即中发［1978］74号文件。文件指出：

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城市要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

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

的非农业人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今后上山下乡不再搞分散插队，可以因地制宜地举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农工牧渔业场、队，集中安置，国家给予扶持。

文件还指出：要积极妥善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要做好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加强对知青的保护工作。

这个文件，可以说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生历史转折的标志。

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成绩虽然做了过多的肯定，但它宣布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并许诺“将来不搞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的观点，都给全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传递了上山下乡运动行将结束的明确信号。事实上，早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关于上山下乡政策要收的小道消息在知青中已不胫而走。会议期间，北京等城市均有下乡知青为要求返城、就业，举行静坐、上访、请愿。因此，等不到会议文件贯彻落实，一个空前规模的知青返城风在各地兴起。



## 不寻常的举动

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了大实话，但也惹了不小的麻烦，几乎成了当时在全国猛刮的知青返城风的理论依据。看看它是如何评述“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

> “文化大革命”之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够吸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
>
> ……林彪、“四人帮”一面把无数知识青年的革命激情和他们做出的重大贡献记在自己的账上，打捞政治资本；一面又竭力通过这个渠道，搜罗和培植张铁生之流等一小撮党羽、走卒，教唆、煽动他们去攻击

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林彪、“四人帮”把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的禁区。他们不仅人为地制造了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矛盾，而且拼命反对毛主席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指示，阻挠和破坏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实，致使许多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林彪、“四人帮”猖狂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这篇评论员文章，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就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据以判断说：“作为减轻生活当中的苦难和强制成分的新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正在静悄悄地撤销不得人心的强迫城市青年下乡安家落户的政策。”

据当时各地的来信与来电反映，许多下乡知青看了这篇文章后感到回城要求有了政治和理论依据，有的地方的知青看了文章后立即到县城街头张贴大字报，说：“上山下乡错了，要求落实政策返城！”“拥护评论员文章”！“否定文革，就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宁愿回城扫马路，淘厕所，也决不回头！”

等等。同时，到当地政府上访的知青猛增，要求像给右派“摘帽”和平反冤假错案一样，为他们落实政策。一些安置知青的县也派专人带着名单到上级政府要求收回下乡知青，说他们不愿再做“四人帮”的“帮凶”了。各地知青闹事此起彼伏。

这个时候，正是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许多会议代表都以为这是《中国青年报》报社根据中央的精神而发表的文章，认为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有些欠妥，对稳定当前的局势不利。云南代表说：云南国有农场的知青正在闹回城，这回火上加油了，工作更难做了。大会代表一致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有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四川等省的代表也联系实际指出：我们吃尽了“四人帮”捣乱的苦头，今天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决不能再乱下去了。

11月29日，大会领导小组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出席会议的负责人和知青办主任就此问题开会，说明了《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并不代表会议精神，更不代表中央的精神。胡耀邦还要求《中国青年报社》吸取这一教训，不要再帮倒忙了。以后为了稳定住众多在乡知青，遏制住“返城风”，全国的新闻宣传都被统一到了“充分肯定知青上山下乡的成绩上来”。

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应该说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以后下乡人数急剧减少。但问题的出现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部分原先下放农村的青年还在“广阔天地”里

受着他们自认为的“煎熬”，他们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为自己的前途而奔跑。尤其是各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心情格外迫切。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文件中曾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却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中央原想稳住200万农场知青，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则普遍认为，自己背井离乡几千里到边疆屯垦戍边，尝尽千辛万苦，如果到农村去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被堵死了，回城的希望破灭。于是，知青工作会议后，农场知青的返城风不仅没有趋于缓和，反而越刮越厉害，当时在农场知青中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能回城的是英雄好汉，回不去的是傻瓜笨蛋！”昔日的自豪感完全被此时的自卑感替代。

1978年6月，原云南兵团三师十团一营二连团支部书记曾某自杀身亡。死者系独子，父亲已退休，当时正病重住院，曾两次写信召唤儿子回家。死者也曾三次要求病退，最后一次申请被拒绝的时间是前一个月，他在死前的团代会上还作了《二连团支部抓纲治国学大寨大见成效》的发言。他在留给他父亲的遗书中写道：“我没有欠任何人的钱。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孝。”



生产队的当家人

一时间，农场知青上访、请愿之风兴起，甚至出现了“闹事”的局面。这种“闹事”首先就是从云南开始的。10月下旬，云南农垦总局西双版纳分局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写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贴在景洪街头，签名者近千人。信的内容主要反映农场知青所处的困境和要求返城的愿望。公开信寄出后杳无音讯，农场领导却因此对签名者百般刁难，实行高压手段。知青只好背水一战。

11月上旬，“第一次各农场知青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的一片橡胶林中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37个营（分场）的40多名知青代表，丁惠民被推举为领导，准备有组织地开展争取回城的活动。

11月16日，他们发出了第二封公开信，仍未得到回音。12月7日，第三封公开信又拟定出来，并成立了“西双版纳州农

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当日即派代表前往西双版纳州委谈判，争取北上请愿合法成行。州委领导采取拖延态度，筹备总组决定以罢工来表示他们要求回城的决心。10日，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开始罢工。16、18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分两批从景洪出发。12月下旬，第一批请愿团在昆明乘火车北上受阻，知青便以卧轨表示抗议。27日，以丁惠民为首的第二批赴京请愿团的几十名代表抵达北京。

云南知青的不寻常举动，使中央领导震惊。12月31日，邓小平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任务时，提到了云南知青卧轨一事，指示：要安定团结，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由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赵凡局长率领的中央调查团，迅速赶赴云南，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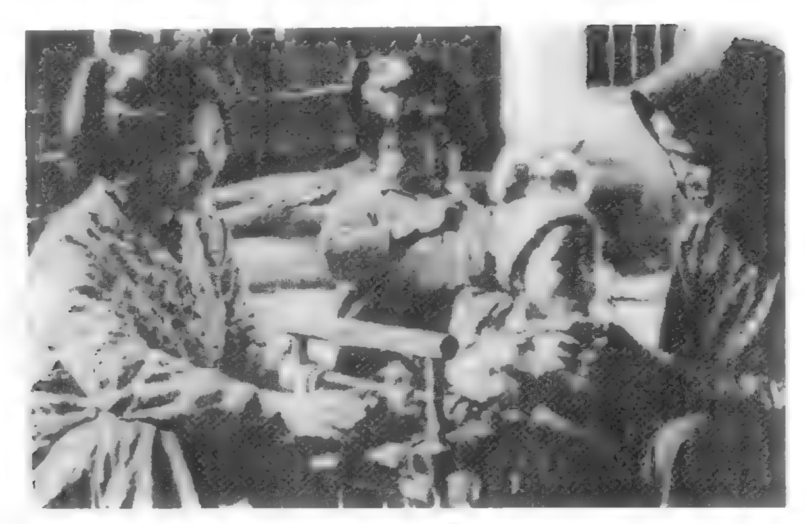
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丁惠民等10名请愿代表。王震殷切地期望农场知青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把眼光放大一些，放远一些，立志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王震的讲话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一个月以后，当上海市发生了知青为返城卧轨拦阻火车的事件时，才在各大报纸上以《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为题，披露了讲话的若干要点。

## 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次中央首长的接见，不可能马上平息知青返城的急切心情。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

1979年1月下旬，当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在云南农场传达时，知青对文件在为插队知青返城开绿灯的同时将农场知青划入另册的倾向性政策极为不满，景洪农场知青首先宣布恢复罢工，声称不达回城目的誓不罢休。接着，与老挝接壤的勐定农场的部分知青因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竟砍断了近百株已经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罢工波及西双版纳以外地区，并且接连发生集体绝食事件，其中勐定农场的绝食事件最为惊心动魄。勐定农场是滇西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一个。全场7000多名知青中有成都知青5000多名，占全垦区成都知青的近1/3。《云南农垦纪略》记载说：勐定农场300名知青于1月5日进驻场部；6日，进驻人数增至1500人，有200人宣布绝食。

这时候中央调查团在云南进行广泛调查，发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诸如：知青过着九（韭）菜一（盐）汤的生活，长时间缺油、缺菜、缺肉，营养极差；女青年中患妇科病的比例很高，知青非正常死亡不断增加，一次事故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女知青和她的小孩

自杀案件屡见不鲜。勐定绝食事件发生后，调查组的负责人赵凡奉中央之命赶到此地，迎接他的是1000多名跪在地上的可怜巴巴的知识青年，只见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所打动，他向知青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识青年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月21日，中央在昆明市召开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善后事宜。23日，国务院又召开紧急会议。副总理余秋里主持，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统一了国务院知青办1月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

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6条意见，即：

积极办好国有农场，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国家给予支持。职工工资适当提高。要尽量把知青稳定在农场，这是前提。

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仍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从国有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以上6条，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

## “能回城的是英雄好汉”

知青终于如愿以偿，于是，大返城开始。

1978年，下放在云南农场的知青将近5万人，到1979年，仅仅过去半年的时间就只有70名知青留在那片土地上。

原云南兵团的知青后来回忆说：

1979年春天，做梦也没有想到知青可以返城，不



一个知青集体户样板

用说，所有的连队都沸腾起来了！有的高兴得跳起来，有的抱着娃娃伤心地哭诉，有的忙着写血书，有的忙着处理家具凑路费回城，有的后悔不该在当地结婚，有的后悔不该找异地知青，有的怨两地分居，想办法托交孩子……真是悲喜交织，不知谁对谁错。知青一窝蜂地挤到场部办公室，开始还有秩序地排队办理，后来大家都觉得太慢，吵得工作人员无法工作，干脆用几十根橡皮筋接起来把公章拴在窗户上，谁想盖谁盖。然后，又像逃难一样找车返城。那些天街头尽是这些返城者。

……

场部大门口的公章悬挂在那里，任什么人来，都

可以盖一下走。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知青可以无条件返城。因此，还都以病退的名义走的，需要农场的病退证明。

干部和老工人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注视着知青的举动。

积愤已久的知青多少有些失去理智。他们烧房子。凡自己盖的房子或集体利用工余时间盖的房子，都烧了。

家具，有的知青不愿留给老工人，也烧了。

甚至碗都砸烂了。

知青生活区狼藉不堪。

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时间里，人们似乎疯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回城去！史卫民、何岚合著的《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下面这件似乎不可思议的事并非“天方夜谭”：

勐定农场有一个连队很偏僻，大约离场部40多公里。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场部开始发放迁移证。消息传到这个连队时，已经几天以后了。欣喜若狂的知青们连夜步行40多公里，赶到场部去领迁移证，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热闹，几百个人满怀期待挤在




一个窗口前。等到一个小个子知青挤到窗口前时，迁移证已发完了。小个子知青如五雷轰顶，跌跌撞撞回到了连里，蒙头就睡。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在门后上吊死了。他太绝望了，以为没有领到迁移证，就是永远回不了成都。其实，过了几天，场部又开始发放第二批迁移证了。

诸如此类事，后人听了简直认为是天方夜谭，可笑可悲。但那时的青年人，那个环境里的知青们有此举，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1979年全国各地知青的大举返城风犹如洪水决堤，势不可挡。从云南边疆，从西北大草原，从祖国的北疆……通往内地的所有交通线上，一幅知青“胜利大逃亡”的景象使这个难忘的春天更添一层悲壮！面对自己撒下过无数汗水的山川大地，每个逃亡者心中的那份酸甜苦辣谁人知晓？有多少人为争取回城，义无反顾，但一旦喝完那杯临别酒，真正踏上归途之后，年轻人的心又是异味无常，一位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这样写道：

明天就要走了，留下一段青春，留下一丝惆怅，留下莫名的遗憾，留下初始的夙愿，远远离开北大荒。

……

我要走了，已经没有了“修理地球”的豪情，也没有了屯垦戍边的壮志。我只想着回北京，就像当年只想着去东北……

## 丁惠民的一份反省

至于由云南农场知青引发的这场“回城风”的波及程度究竟如何，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云南垦区的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即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河北、山西、甘肃、宁夏、贵州、湖北、广东、西藏除外）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2月形成一股声势很大的“回城风”。其特点之一是来势猛，波及面广。不仅许多的农场知青闹回城，在插队的已婚知青、已在当地城镇安排就业的知青、下乡后参军又复员在外地工作的知青，以及各类下放

人员子女，也都引起连锁反应。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地方出现了相似的越轨行为。一般是四处串联，成立各种形式的请愿组织，先是发传单、出小报、贴标语、集体上访、请愿游行，而后发展为任意罢工、绝食，甚至发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砸毁公物、抢劫商店、破坏交通等违法行为，严重破坏社会安定。例如：新疆阿克苏地区几个国有农场的上海支边青年，从2月4日开始成群结队集会游行，筹集资金，要求回上海。不久，波及阿克苏垦区的16个团场和城区工交建企业单位。一些上海支边青年组织赴京上访团，签写万名摺，围攻殴打干部，拦截车辆，多次罢工停产。

这场回城风波，在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还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但是，由于知青离场过猛过急，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如黑龙江兵团在几个月中有15万名知青集中办理回城，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建三江农管局所属农场职工中，知青占8%，一下子返城3/4，出现“机车没人开、账目没人算、学生没人教，病号没人管”的现象。刮这场风，遭受损失最严重的要数云南垦区了。到1979年末，上海到云南各农场的4.76万人，剩下3000人；四川去的4.1万人，只剩下500人。

对于这场风波引发的后果，云南赴京请愿团负责人丁惠民在1979年1月23日给王震发出的电报中也作了一番反省：

>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一两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虑的少，但是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

当时的许多传媒对这次大闹返城也进行了狠狠地批评，有的指责是无理取闹；有的指责是失去革命斗志的表现；也有的表示体谅。5月12日刊载在《阿克苏报》上的《五月遐想》，是一首以朋友口气教训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

> 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
> 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

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

不管怎样，返城风声势浩大，此起彼伏，最终以下乡知青大举返城而落下帷幕。过程虽过于偏激，造成的后果也不堪目睹，但知青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其原因很多，本书无需对其进行深研细究，只是出于对《中国知青悲欢录》一书中张力甫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文中的最终结论感兴趣而已，则将它摘录下来：

知青返城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中国要办大事都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大象屁股推不动"。可是知青汇成这个涉及全国各地各县各农场各公社的大问题，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大概有这么一些原因：

首先是知青自己的据理抗争，尤其是云南农场和

黑龙江农场，在这里的知青，既集中又有天然组织，能掀起较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其次是社会各界的支持。知青的命运同全国城乡休戚相关，城里人有子弟在农村，农民则有知青在自己的村里，社会普遍同情知青。

再次，当时邓小平等遭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同情和理解知青的处境，并将此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项内容，以稳定民心，驱动改革之轮。

最后有一个机遇问题。就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首先要有边疆的安定团结，像这样的知识青年闹事，当然会给边疆添乱，不如早早请出为妙。不过这些都是咱们的猜测罢了。不管怎样，8万知青终于能回城了。

## 中央不再提倡上山下乡，出台落实知青政策，知青运动告终

至1979年，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云南边疆农场知青大闹返城的胜利声中接近尾声，国家原计划动员81万知青下乡，最后也只有近25万人下去。最多的辽宁、黑龙江两省各下去5万多人，上海和西藏两地干脆不动员下乡。到了1980年，就有贵州、云南、西藏、宁夏、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10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停止动员下乡。其他19个省、市、自治区也只动员了15.5万人到郊县知青场队。




## “再不要提倡上山下乡”

当时，我们国家也下了大决心准备彻底解决知青问题。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在讨论教育工作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总书记胡耀邦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过去那种方法也有点道理，粮食没有过关，要吃饭啊！要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必须采取政治鼓励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他批评说：有些同志在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上，思想包袱过重，忧虑过头，或者相当不解放。最近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从广开门路、发展生产着眼，并且放开手脚，走群众路线，搞集体所有制，大中小城镇的几百万待业青年都可以安排工作。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以后不要再提倡上山下乡，像北京，我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了；北京、上海可以多办师范学校、医科院校，派教师、医生支援落后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工资可以提高一点，这比拿大笔钱搞上山下乡划算。

在这以后，各地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从1980年暑期起，对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组织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需要进行统筹安排。而且在这一年的夏季，国务院知青办对一

年多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并向中央作了汇报。在过去一年里，国家通过城乡广开门路，安排了350多万插队知青就业。特别是近百万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得到了优先安排。尚在农村的200万插队知青可望在年内大部分得到安排。多年积累的插队知青问题，可以基本解决。从此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调整了安置形式，在城镇郊、县办起了8000多个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已经安置了50多万知青，且有的已有了一定的吸引力。

9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印发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原则统一的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今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安排，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实行城乡统筹，把城乡两方面安排知青的工作逐步统一起来。具体到一个地方，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上山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

为了解决好插队知青的善后问题，《意见》要求：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

“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是周恩来总理1965年对上山下乡工作讲过的两句话。这两句名言自1965年以来多次出现在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了党和国家指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各级领导在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的行动指南。

《意见》还提出：今后需要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去农村的地方，应实行政治动员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进场队的知青其城镇户粮关系不变，留场就业的计算工龄。各地知青工作机构如何调整（包括并撤）不强求一律，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广开就业门路，采取多种途径，抓紧安排插队知青，尤其是老知青。于是到1981年各地基本停止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而是集中精力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96万插队知青的安排问题以及大量需要处理的知青遗留问题。比如知青场队的整顿和归属问题，知青经费和物资清理、处理问题，插队知青的工龄如何计算问题，在乡已婚知青的安置及子女回城上学问题，知青中的冤假错案平反问题，病残知青的安置问题等。这些问题情况复杂，政策性又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

## 落实知青政策

针对上述情况，国务院知青办虽然提出了《关于当前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但是真正落实起来，并非易事，其中最难办的是以下三件事：

首先就是已婚知青的安排问题。

一位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倾诉着：

> 历史不会忘记：1970年前后，近10万知识青年涌入云南胶园，其中，有6万人分到了西双版纳农场，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
>
> 8年后，一股回城热潮又席卷知青阵营。
>
> ……
>
> 1979年，西双版纳6万知青"大逃亡"，一时间，走的走，调的调，一片纷乱。
>
> 因为当时知青回城有条政策：已结婚的知青不能回城。于是，5天内，西双版纳有3000对夫妻集体离婚，3000个家庭因为希望而破裂，3000对男女在月老的叹息中分手。
>
> 犹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该怎样选择最佳的形式完成各自的人生，那得依千差万别的个人的具体境遇而定。在6万知青蜂拥回城的热潮中，有1238个知青却留了下来。
>
> ……




尽管这1238个留下来的知青是因千差万别的个人的境遇而定，但已婚是让他们放不下那份纯真感情却又无可奈何地留在了这片令他们辛酸的土地上的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对于未婚知青和双知青结婚的，还好办一点，各地主要通过招工陆续回原动员城镇安排，山东、山西等省和西安市还规定，如当年（指1980年）内招工安排不完，余下的知青一律收回城镇待业，1981年优先安排。而与职工结婚的知青，原则上由职工所在地负责安排。

在已婚知青中，最棘手的莫过于那20万与农民结婚的知青的安排。这些知青不能简单采取回城安置的办法，因为这样会造成夫妻两地分居，可能使家庭破裂，而且给城镇带回来许多农村户口，也使城镇人口膨胀加剧。因此，各地在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就近就地安排的原则下，还须区别情况妥善解决。其具体办法是：1. 当地全民或集体企事业单位招工时，优先照顾录用；2. 有条件的社办或镇办企业吸收一部分，并将知青转为非农业户口；3. 县办国营农林场酌情安排一部分，并允许全家进场；4. 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厂）队安排一部分，转为集体职工；5. 允许某些有技术专长或手艺的知青从事个体经营。

为了加快解决跨省插队的已婚知青的问题，一些大城市积极协助安置地区工作，并从经济上给予适当支持。1980年6月，上海市委决定拿出1300万元，分别支援浙江、江苏、安徽、江

西等省，作为安置上海跨省插队知青的专款。

已婚知青的问题解决不好，将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只有积极稳妥地安排好他们的出路，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照顾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才会有助于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和住房压力，促进安定团结。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安置条件差异很大，对已婚知青的安排并没有完全办好，据在4万多农婚插队知青中的调查，到1982年仍有3600多人未安置落实。这些人多数地处偏僻山区，居住分散，工副业很少，安置起来的确困难。政府虽然给了他们一次性的补助（每人500元），但他们的实际困难并未得到解决。后来当地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落实农婚知青的责任田、饲料田，在社队企业或知青场队垮了以后，允许他们回家种地；有一技之长的知青，支持他们自谋职业或个体经营；符合招工条件的，可以通过招工就地安排一部分农婚知青担任小学教师、信贷社办事员、养路工、运输工等。

1984年劳动人事部再次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的通知》，提出：对处理下乡插队知青的遗留问题要善始善终，要保持工作的连续性，随着机构的调整，劳动人事部门应当把这任务继续承担下来，要有领导分管，要有专人去抓；要继续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体现政策，取信于民，对各项遗留问题的处理，仍按原定政策办，对于新情况下

出现的新问题，各地可以从实际出发，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对与农民结婚的插队青年，仍然要坚持就近就地安置的原则，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办法安排。尤应注意向他们宣传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的新形势，鼓励他们走自力更生、勤劳致富之路，克服单纯依赖国家、要“铁饭碗”的思想。鼓励和扶持他们自谋职业，就近就地从事多种经营和开发性生产，等等。

各地在贯彻落实劳动人事部这一《通知》时，结合本地区情况还采取了一些补充措施。到1985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仍在农村的，已为数不多了，这都是国家和各地知青办的干部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的结果。

第二件难办的事：已婚知青子女的就学入户问题。

主要是个“农转非”的问题。由于知青的婚姻类型不同，解决其子女的农村户口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双知青家庭子女的户口问题相对要容易解决些；对于那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来说，其子女的“农转非”解决程度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家庭，其难度更大。因为在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惯例是子女户口的性质取决于母亲的户籍，那么，一个男知青与一个女农民结了婚，往往是男方被国家安排了工作，转成了城镇户口，而女方仍然是农村户口，那他们的子女也同样是农业户，不得“改换门庭”。

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明文规定是这样的：下乡知青间结婚的，调离后其子女随同迁入市镇吃商品粮；只有女方离开农村的，其子女随母亲迁往市镇吃商品粮；只有男方离开农村的，子女户口暂不迁走，待女方安排工作后再随母亲迁入市镇。下乡知青与非农业工人结婚的，离开农村时其子女可随同迁入市镇转吃商品粮。下乡知青与农民结婚的，调离农村时，包括安排在社队企事业单位工作，无论男女，均可带1名15周岁的子女迁入市镇转吃商品粮。

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下乡知青子女的“农转非”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

第三件最难办的事：关于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问题。

1977年9月3日，国家劳动总局在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出：上山下乡插队和插场的知识青年，经招收为国家职工的，插队和插场期间不计算为工作年限。这就等于把大量插队插场的回城就业知青排斥在工资调整范围之外，引起许多回城知青的强烈不满。

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中，为了鼓励知青上山下乡到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厂）队就业，规定：从入场（厂）队之日起计算工龄。这就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计算工龄开了个小口子。

1981年7月7日，为了鼓励城镇待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国务院发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规定城镇个体经营者可以从批准经营之日起，按实际从业年限计算工龄。

也就是说，城镇青年，不论从事集体、个体以至上山下乡参加知青场（厂）队劳动的，都可以计算工龄。但唯独把老知青多年插队时间给排除在外，这又使许多老知青对国家政策不满。北京市原插队知青联名写了封信给国务院知青办：

国务院知青办：

我们以急切的心情向您反映关于插队期间的工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虽然在群众中广有议论，但一直悬而未决。在国家机关调整工资的前夕，不得不申诉我们的意见。

我们是1968年左右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1978年前后陆续病退、困退回京。参加工作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工龄问题。和我们差不多同时下乡，从兵团、农场回来的知青都可以从下乡之日起计算工龄，唯独插队回来的需要从零开始，好像这10年都白干了。我们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合理。众所周知，在当年的时代，无论是去参军、去兵团，还是去插队，都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十年动乱中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去插队完全是根据组织的分配，是当时的大政方针，我们响应号召去了，是听党的话的表现，比那些少数在北京软磨硬泡、赖着不走的人强多了，可是结局呢？他们在我们走后不久就分配了，现在已是有十几年工龄的3、4级工了，而我们呢？流血流汗地干了十几年全白搭了。30多岁了，再从头开始，这能让人服气吗？最艰苦、最贫困的也莫过于插队的，我们没有工资，没有节假日，没有公费医疗，没有探亲假，不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都比其他同龄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别人的10年都得到了组织的承认，唯独我们这10年无人承认，这太不公平了。这样人为地制造出同龄人之间的悬殊差距，有百害无一利。首先，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由于没有工龄，不仅工资级别低，而且看病（病假扣工资）、住房（凭工龄分房）、调级（没有工龄难于和别人竞争）、子女入托等等切身利益问题都受到严重影响。我们都是30开外的人了，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已经35、36岁了，绝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父母年迈需要赡养，但一般是二级工，工资只有30多元，最高的40出头，在物价上涨的今天，生活负担之重是可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影响这部分人




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党的信誉。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还有什么干劲可言呢？

十年动乱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比我们个人大得多，我们能够理解，因此，绝不会刁难组织，提什么无理要求。只是请求有关部门能够正视这一问题，承认我们这10年也是革命工作。

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现在国家机关工作，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如果工龄问题不解决的话，恐怕就要失去这次难得的调资机会了。一个人一生中能赶上几次调资呀？请设身处地地为我们想想吧！我们相信党和国家一定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呼声，公正完满地解决这十年动乱的遗留问题。到那时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四化建设中去，为祖国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北京市新技术研究所等53各单位的

92名原插队知青（署名略）

1982年7月

那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国家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提出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一个特殊性问题加以解决。即：凡从1962年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来、经批准插队的知识青年（包括随父母到“五七”

干校的达到劳动年龄、参加劳动的子女），在他们参加工作之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计算工龄，并且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其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

1985年6月28日，劳动人事部正式将国务院批准同意的《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通知规定：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返城后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不计算工龄。工龄的起算时间，可以由原插队知识青年现在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单位（含县、团级单位），根据本人档案中履历表和其他有关材料填写的下乡日期审定；对个别有异议的，可经所在单位调查，报县以上劳动人事部门审批。已安排工作的原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按此通知精神计算工龄之后，对于他们与工龄有关的工资福利待遇的问题，过去的，不再找老账；今后的，按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与同工龄的职工一视同仁。在1962年至“文革”开始前，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回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在工龄计算上可以依照上述办法处理。

上山下乡运动过去很多年了，但它留给当事者和后来者

的永远是一段难忘的和费解的回忆。曾经在内蒙古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当过知青的金环说：

有人把上山下乡运动比作"席佛西斯"的石头，他们被一位巨人滚上山顶，又被巨人从山顶上推下来，他们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却又是那么虔诚的相信，这种滚动是他们这一代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可是当他们在滚动中遍体鳞伤的时候，狂热的头脑开始冷却，急剧地冷却，他们对这种毫无目的的滚动开始发生怀疑,这是本能的清醒。他们一边舔舐着自己的伤口，一边向席佛西斯，也向他们自己发问，是发自心灵深处的质问:"这种滚动的目的何在？"

《中国知青部落》的作者郭小东说：

这场发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知青运动，在此后10年间，从狂飙突起到大规模的退潮，这个来去匆匆的历史事实，淹没在当代中国熙熙攘攘的政治运动中，它无论对于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或是对于每一关注着中国现实政治，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外国专家们，至今都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地

解释这个运动的缘起以及运动过程的种种变幻，包括它后来悲剧性终结的历史原因。

## 历史不会忘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阴霾消失后，永远地拉上了帷幕，它留给人们的是爱、恨、悲、叹的历史记忆。尽管那是一场灾难所孕育出的一个怪物，但作为其受害者——中国知青为其所付出的一切是不容历史忽略和抹杀的，应该说，它磨炼出了一整代年轻人，他们——当年的知青并不后悔，他们更加自信，他们更加坚强，他们更加自豪！

1990年，剪不断、理还乱的知青情结——“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在首都北京举行。《中国青年报》以显著标题《开拓、卓越精神的闪烁》，盛赞北大荒的业绩：“……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便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是时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亵渎，纵然岁月异常而此精神不可轻薄。因此它是祖先至我们以人类的名义所肯定的奋勇……”

他，叫高建国，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北京人，1966年高中毕业，去了北大荒，1978年年底回北京。就在他刚要离开北

大荒的时候，他的妻子为他在北大荒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双胞胎会给他回北京带来什么好运？没有工作，没有房子。妻子带着刚落生的双胞胎挤在娘家。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年的夏天，妻子找到了一个汽车公司的工作。他也在一个监狱里做事。回京后的生活是如此令人叹息，也让人总是充满希冀。长期繁重的家务和学习，他觉得体质逐渐下降，有时感到胸闷、胸疼。他仍然在坚持着读夜大。许许多多工作，包括他回京后的生活，还仅仅是开始。当然，他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垮下来，他给自己制定了三条规定：戒烟；打太极拳；游冬泳。他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骑上35分钟的自行车，到玉渊潭游冬泳。带着冰碴儿的碧绿湖水在迎接他。那不仅是一种对身体的锻炼，更是一种对生活的考验，一种对意志的磨砺。为了什么？为了事业？为了明天？自然，也为了孩子，还包括他自己。他自己也这样说："也为了北大荒！让别人看看北大荒所给予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失望和悲伤，毕竟给了我们一生最难忘，也最可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当我们在青春和理想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一种淬火和锤炼！那就是凤凰涅槃！"

他，叫戴建平，也是1966年高中毕业生，在北大荒一干就是好几年。后来他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天坛医院当医生。1979年他去了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总院留学进修。他是自费留学的。1982年他又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和有些从北大荒归来的老三届一样，他也有可能悲观。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自学奋斗，

一直把一种精神带到美国留学生活之中。为什么能这样？他说："当然，除了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激励之外，就是北大荒激励了我。不知为什么，我诅咒过北大荒，可是，在美国，我才深切地感到北大荒的那段经历是难忘的。在我的身上已经潜移默化，带有不可抗拒的北大荒的热血！"

走过炼狱的知青们，他们是不会忘记过去，更不会背叛自己的过去呀！

这里，笔者特别抄录一些知青对自己的那段岁月所发表的感想和看法：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福建知青舒婷

对这10年，我始终不悔。当时的我毕竟是充实的。应该说，那是红红火火的10年、轰轰烈烈的10年。或者再过10年、20年、30年，我们可以自豪地对后人说：当年在北大荒，我们曾忘我地战斗过……

——黑龙江兵团王鲁庆

边疆给了我什么呢？没给我金钱，没给我官阶，没给我轻歌曼舞，而生活赐予我们的恰恰是无价的财富：勇敢、坚韧、奋进。

——云南兵团一知青

青春无悔并非是要回避那段严峻的历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段历史使这一代人更加清醒、更加成熟。正是由于有这一杯苦酒垫底，才使得这一代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和事业上，更加奋力拼搏，有所建树，去夺回已逝去的宝贵年华。

——云南兵团林新春

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再有什么样的苦也已经不觉得。我们受了那么多的难，还有什么样的困难能挡住我们？老天爷既然给了我们特殊的命运，那么也必将造就特殊的一代。

——内蒙古兵团唐惠国

不论是千千万万知青的先驱；不论是少年赴边被

"马文化"深深的熏陶过的男子汉；不论是以知青历史验证地质理论的探矿人；不论是引进政府行为"支边"的"官员"；不论是视草原为保护神的京城"青马莲"；老知青都在唱着青春时代的歌！

——内蒙古知青宋红岗

历史是不公平的，却又是公平的，它给这代人带来了不幸，但也造就了一批坚忍不拔的人。成名于京城的"荒妹子"张占英，是下乡回城后靠"大碗茶"起家的女强人，当年她就在北大荒当过几年知青，20世纪90年代她是北京市城市生产合作总社副主任。回忆自己所走过的路，她不无感慨地说：先有"北大荒"，



1979年8月26日，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王震、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出版先进知青代表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



1996年2月20日，李鹏在延安接见留在延安工作的北京下乡知青代表并进行了座谈

后有“大碗茶”，有了“北大荒”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情。

20世纪90年代任过中国商业出版社社长的石肖岩，也是一位北大荒的知青，1993年他回访故土时说：“我们是应大潮而来，应大潮而退。失去的不是所有的一切，我们得到了很多。比如北大荒精神，对我们人生道路的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著名相声演员姜昆，更自豪地说：“虽然我现在已是中国文化界有些‘名气’的人物，但在很多场合，我还是这样告诉大家，我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依然眷



1985年5月2日，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30年前到北大荒的北京青年垦荒队队长杨华

恋着那片神奇的土地。”

如今，这些当年受尽磨炼的知青们，都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成了所在单位的顶梁柱！即使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也都留下了知青的足迹，他们，都以自己曾经历经的沧桑，展示着自己多姿多彩的人生。

有篇报告文学，题目叫《跨世纪的“桥梁”——来自“老三届”的报告》，记载着“老三届”如今的脚印：

案头一份人口变迁资料透露：当年，上海的“老

三届"达100万人之众，占上海总人口的10%。时光流逝，花谢花开。当年的"老三届"，已先后步入不惑之年。迄止壬申年，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有44周岁，最小的也有38周岁了。

一份对600名"老三届"的职业抽样调查报告说，他们中间有81%的人，从事过两种以上的职业。他们目前从事的职业大类是，职工41%，基层干部37%，科技人员和教师21%，其他1%。

上海市1991年干部统计年报也显示：全市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有各级各类干部116万，其中36—45周岁的干部占干部队伍总数的30%。与此同步，有关统计部门在对上海10个区县局的机关、事业单位、党群团体、工矿企业、科研院校的"老三届"干部作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38—44周岁的"老三届"干部数，分别占36—45周岁干部数的66.2%，是干部队伍总数的21%。

如今，"老三届"中的大多数人已在上海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级岗位肩负重任，担当起挑大梁的角色，被人们赞誉为跨世纪的"桥梁"。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一句名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段历史，已经写进了共和国历史教科书。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更是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他们曾经是历史的亲历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正在书写着新的人生！

[General Information]

□□=□□□□□□□□□□□□

□□=□□□□

□□=179

SS□=13528820

DX□=

□□□□=2014.05

□□□=□□□□□

